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

(刑事部分)

公约第六条适用指南

COUNCIL OF EUROPE



CONSEIL DE L'EUROPE

出版商或有关组织希望出版或在网上公布（或翻译）本报告的，请联系 publishing@echr.coe.int，咨询相关信息。

©欧洲理事会/欧洲人权法院, 2014

本报告可于以下地址下载www.echr.coe.int (Case-law – Case-law analysis – Case-law guides)

本指南由研究部提供，对法院没有拘束力。指南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完成;之后可能需要进行编辑修改

公约第六条适用指南
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刑事部分）

介绍.....	4
I.适用范围：“刑事”的概念.....	5
(1) 纪律处分程序.....	6
(2) 行政法、税法、海关法、财政法、竞争法程序.....	6
(3) 政治问题.....	7
(4) 驱逐和引渡.....	7
(5) 刑事程序，附带程序以及后续救济程序的不同阶段.....	7
II. 一般保障.....	8
A. 接触法院的权利.....	8
B. 一般保证：机构要求.....	10
(1) “审判机构”的概念.....	10
(2) 通过法律设立的“审判机构”.....	10
(3) 独立和公正.....	11
(A) 独立的审判机构.....	12
(B) 公正的审判机构.....	13
(1)公平.....	16
(A) 两造平等和对抗制程序.....	16
(B) 司法判决的理由.....	17
(C) 保持沉默权与不自证其罪权.....	18
(D) 非法或违反公约权利使用证据.....	20
(E) 引诱犯罪.....	21
(F) 对公正诉讼保障的放弃.....	23
(2)公开审讯.....	24
(A) 公开的原则.....	24
(B) 口头审讯和出席庭审的权利.....	24
(C) 上诉程序.....	25
(D) 公开原则的例外.....	25
(E) 判决的公开宣判.....	26
(3) 合理的时间.....	26
(A) 对程序持续时间的决定.....	26
(B) 合理期限的评估.....	27
(C) 几个例子.....	28
III. 特殊的保护.....	29

A. 无罪推定.....	29
(1) 证明责任	29
(2) 法律与事实的推定	29
(3) 第六条第二款的范围	30
(A) 刑事程序.....	30
(B) 后续法律程序	30
(4) 有偏见的陈述	31
(5) 司法机构的陈述	31
(6) 公职官员的陈述	31
(7) 媒体负面的行为	32
(8) 未提供信息的制裁	32
B. 第六条第三款：辩护权.....	32
(1) 第六条第三款(a)项	33
(A) 综述.....	33
(B) 有关指控的信息	33
(C) 改变指控	34
(D) 详细.....	34
(E) 立即	34
(F) 语言	34
2. 第六条第三款（b）项.....	35
(A) 一般考量	35
(B) 适当的时间	35
(C) 适当的便利条件	36
3. 公约第六条第三款（c）项：由本人或者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的权利.....	37
(A) 适用范围.....	37
(B) 自行辩护	38
(C) 法律协助	38
(D) 法律援助.....	39
(E) 实际有效的法律协助	40
4. 第六条第三款（d）项.....	40
(A) “证人”的自治意义.....	40
(B) 询问证人的权利	41
5. 第六条第三款（e）项.....	44
(A) “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	44
(B) 刑事程序中所保护的内容	44
(C) “免费”协助.....	45

(D) 翻译的条件.....	45
(E) 积极义务.....	45
IV. 第六条的域外效力.....	46
(1) 公然拒绝司法.....	46
(2) “实际风险”的标准以及举证责任.....	46

介绍

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

第六条 – 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

1.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公平且公开的审讯。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及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或者是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的利益的话，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

2.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在未经依法证明为有罪之前，应当推定为无罪。

3.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 (a) 以他所了解的语言立即详细地通知他被指控罪名的性质以及被指控的原因；
- (b) 应当有适当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为辩护做准备
- (c) 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协助费用的，则基于公正利益考虑，应当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 (d) 询问不利于他的证人，并在相同条件下，让有利于他的证人出庭接受询问；
- (e) 如果他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可以请求免费的译员协助翻译。

1. 本指南，作为欧洲人权法院发布的判例指南系列的一部分（下文称“法院”，“欧洲法院”或者“斯特拉斯堡法院”旨在让法律工作者了解由斯特拉斯堡法院所做的基本判决。该指南分析并总结了截止到 2013 年 31 号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刑事部分的判例（下文称“公约”或者“欧洲公约”。读者们将会发现该领域的重要原则以及相关先例。本指南所援引的判例是经过选择的：它们都是最为典型、重要、新近的判决和决定¹。

2. 本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在事实上并不仅作用于本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而是在更宽泛意义上用于阐明、保障和发展欧洲人权公约中所设立的规则，从而让缔约国得以更好地遵守（[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 154）。因此，欧洲人权公约体系的使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对公共政策层面的事项作出决定，从而提高人权保护的标准并在整个公约缔约国集团内扩展人权的司法保障体系（[Konstantin Markin v. Russia](#) [GC], § 89）。

¹ 文中所引判决和决定的超级链接连接到该文件的原始英文或法文文本（本法院的两种官方语言）。读者可访问本法院的 HUDOC 判例法数据库来获取这些判决和决定的英文或法文文本，以及其他语种的译本。

I.适用范围：“刑事”的概念

第六条第一款——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

“1. 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都有权由……审判机构进行公正的……审判……。”

A. 一般原则

3. “*刑事指控*”的概念是一个“*自治*”概念，独立于成员国国内法律体系分类。

4. “*指控 charge*”的概念须在公约的范围内进行理解。因此，它可能被定义为“*主管当局发给一个人的指控他已经犯下刑事罪名的官方通告*”，这个定义也与有关“*[嫌疑犯]的状况是否在本质上已经被影响*”的测试相符合(见，例如，[Deweere v. Belgium](#), §§42 and 46, 和 [Eckle v. Germany](#), §73)。法院认为被拘留的人，在作为目击证人被讯问之前被要求宣誓时就已经是“*刑事指控*”的主体，并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Brusco v. France](#), §§46-50)。

5. 至于“*刑事*”的自治含义，公约并不反对缔约国“*非刑事化*”趋势。然而，非刑事化后归类于“*规章*”的罪名仍可能归于自治概念“*刑事罪名*”之下。让国家自由裁量是否排除这些罪名可能导致结果与公约的目标和目的不相符 (见 [Ozturk v. Germany](#), §49)。

6. 评估是否适用公约第六条刑事方面的规定应基于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82-83 案件中列出的标准：

- (1) 国内法律的分类
- (2) 罪行的本质
- (3) 相关人可能承担的罪名的严重性，

7. 第一个标准只有一般重要性，仅在一开始起作用。如果国内法律把某一罪行归类于刑事，那么这一标准就满足了。在评估第二个更重要的标准时 ([Jussila v. Finland](#)[GC], &38)，要考虑下列因素：

—是否有关的法律规则仅直接指向特定群体还是有普遍约束的特征 ([Bendenoun v. France](#), §47)；

—程序是否由有法定执行权的公共机构进行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法规是否有惩戒或威慑目的 ([Öztürk v. Germany](#), § 53; [Bendenoun v. France](#), § 47)；

—刑罚的确定是否依赖于有罪裁定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

—欧洲委员会其他成员国对这类程序是如何归类的([Öztürk v. Germany](#), § 53)

9. 第三个标准参照相关法律可能规定的最重刑罚而确定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72; [Demicoli v. Malta](#), § 34)。

10. 在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案件中确定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标准是选择性标准，并不需要同时满足；为了使第六条可以适用，罪行应满足从本质上被认为是公约规定下的“*刑事*”，或者罪行能使人承担罪责，而该罪责就其本质和严重性来说一般属于“*刑事*”的范畴之内 ([Öztürk v. Germany](#), § 54; [Lutz v. Germany](#), § 55)。一项罪行并未判处监禁刑的事实本身并非决定性的，因为缺乏相对严重的惩罚不能否定罪行内在的刑事属性([Öztürk v. Germany](#), § 53; [Nicoleta Gheorghe v. Romania](#), § 26)。

然而，当分别分析每一标准不能对刑事指控的存在达成一个明确的结论时，那么可以采用累计的方法([Bendenoun v. France](#), § 47)。

11. 在使用“*刑事罪行*”和“*指控一项刑事罪行*”时，第六条全部三款的规定指的是相同的情形。因此，第六条全部三款是否适用的检验在刑事项下是相同的。

B. 一般原则的适用

(1) 纪律处分程序

12. 违背军队纪律判处羁押于部队数月刑罚的罪行，属于公约第六条刑事项范围内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85)。相反的，两天的拘禁被认为时间太短而不属于“刑事”的范围内(同上)。

13. 至于职业纪律程序，法院认为其没有必要对此事项进行裁决，法院认为该程序落入民事范围之内，因此该问题仍然是开放的 (*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 30)。在纪律处分程序导致公务员强制退休的案件中，法院发现这类程序不是第六条意义上的“刑事”，因为国内当局设法将决定控制在纯行政领域范围之内 (*Mouillet v. France* (dec.))。有关军官因违反纪律而免职的纠纷也被排除于第六条刑事项范围外 (*Suküt v. Turkey* (dec.))。

14. 当“适当考虑”监狱的情形或者特殊的监狱纪律制度时，基于罪名的本质以及刑罚的本质和严重程度，第六条可能适用于监狱违纪罪行（在 *Ezeh and Conno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82 中，40 天外加 7 的羁押；相反的，见 *Štitić v. Croatia*, §§ 51-63)。然而，关于监狱系统之类的程序原则上不落入第六条刑事项范围之内 (*Boulois v. Luxembourg* [GC], § 85)。因此，例如，对犯人进行严密监控并不涉及刑事指控；被告向法庭就该行为以及可能伴随的限制措施提出质疑都应在第六条第一款民事项下进行检验。

15. 法院判令的有关法庭程序过程中扰乱法庭秩序（藐视法庭）的措施被认为是落入第六条范围之外，因为这些措施与行使纪律处分权利相似 (*Ravnsborg v. Sweden*, § 34; *Putz v. Austria*, §§ 33-37)。然而，刑罚的本质和严重性可能使第六条适用于藐视法庭的罪行，如果这种罪行在国内法下被定为刑事犯罪 (*Kyprianou v. Cyprus* [GC], §§ 61-64, 关于五天监禁的刑罚)。

16. 至于藐视议会，法院区别了立法机构，一方面规定了针对其议员违反特权的内部程序。前者可能被认为本质上是纪律处分，然而法院认为后者可以被认为是刑事，考虑到刑事的一般适用和可能施加的刑罚的严重性（在 *Demicoli v. Malta*, § 32 案中长达 60 天的监禁和罚款）。

(2) 行政法、税法、海关法、财政法、竞争法程序

17. 下列行政违法行为可能落入第六条刑事项范围内：

- 因道路安全违法行为被处罚金或驾驶限制，例如减分或被吊销驾照的处罚 (*Lutz v. Germany*, § 182; *Schmautzer v. Austria*; *Malige v. France*) ;
- 导致滋扰或破坏和平的轻微违法行为 (*Lauko v. Slovakia*; *Nicoleta Gheorghe v. Romania*, §§ 25-26);
- 违反社会保障法律的违法行为（未能申报就业，尽管判处的是最轻微的罚金刑, *Hüseyin Turan v. Turkey*, §§ 18-21) ;
- 宣扬和散布助长种族仇恨材料的行政违法行为，可受到行政警告和没收相关出版物的处罚 (*Balsytė-Lideikienė v. Lithuania*, § 61) 。

18. 满足下列因素之一时，第六条被认为适用于加收税收滞纳金程序中：

- (1) 法律设定的处罚涵盖所有构成纳税人的公民；
- (2) 税收滞纳金不认为是对损害的金钱补偿，而本质上被认为是防止再犯的惩罚；
- (3) 根据一般原则，税收滞纳金具有威慑和惩罚目的；
- (4) 税收滞纳金是实质的（[Bendenoun v. France](#)；反之，见 [Mieg de Boofzheim v. France](#) (dec.) 案中未如期付款的利息）。

即使加收的滞纳金很少，但犯罪行为本质可能足以导致第六条的适用（[Jussila v. Finland](#) [GC], § 38中，需要交纳10%滞纳金的义务）。

19. 公约第六条的刑事事项被认为适用于海关法（[Salabiaku v. France](#)），适用于对预算和财政有管辖权的法院判处的处罚（[Guisset v. France](#)），适用于在经济、财政和竞争法领域有权利的某些行政当局（[Lilly France S.A. v. France](#) (dec.)；[Dubus S.A. v. France](#)；[A. Menarini Diagnostics S.r.l. v. Italy](#)）。

(3) 政治问题

20. 第六条刑事方面不能适用于涉及选举制裁（[Pierre-Bloch v. France](#), §§ 53-60），政党解散（[Refah Partisi \(the Welfare Party\) and Others v. Turkey](#) (dec.)），议会调查委员会（[Montera v. Italy](#) (dec.)）诉讼；也不能适用于就国家总统严重违反宪法启动的弹劾诉讼（[Paksas v. Lithuania](#) [GC], §§ 66-67）。

21. 至于卧底程序，法院赞成刑事内容的主要方面（违法行为的本质-不真实清洁宣言-以及惩罚的本质和严重性-禁止某些职位有很长的任期）可能使那些程序落入公约第六条刑事事项的范围（[Matyjek v. Poland](#) (dec.)；相反的，见 [Sidabras and Džiautas v. Lithuania](#) (dec.)）。

(4) 驱逐和引渡

22. 驱逐外国人出境的程序不落入第六条刑事事项下，尽管事实上他们可以提起刑事诉讼（[Maaouia v. France](#) [GC], § 39）。这种排除方式同样适用于引渡程序（[Peñafiel Salgado v. Spain](#) (dec.)）和有关欧洲逮捕令（[Monedero Angora v. Spain](#) (dec.)）的程序。

23. 然而，不同的是，替代监禁刑地驱逐出国家领土十年可能被认为是与初始定罪相同的刑罚（[Gurguchiani v. Spain](#), §§ 40 and 47-48）。

(5) 刑事程序，附带程序以及后续救济程序的不同阶段

24. 防止违法或犯罪行为所采取的措施不在第六条的保护之下（警方的特殊监督-[Raimondo v. Italy](#), § 43；或警方向对学校的女孩实施猥亵行为的青少年提出的警告-[R.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25. 至于审前阶段（询问，调查），法院认为这应包括在刑事程序整体之中。因此，第六条下的一些要求，例如合理的时间要求或辩护权，可能在这些程序阶段需要考虑。因为如果在初始阶段就不符合这些规定，那么公正审判就可能遭到严重损害（[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 36）。尽管调查法官不决定“刑事指控”，但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后续程序的行为和公正性，包括实际审判，有直接的影响。基于此，第六条第一款可能被

认为适用于由调查法官进行的调查程序，尽管第六条第一款下的一些程序性保障措施可能不适用(*Vera Fernández-Huidobro v. Spain*, §§ 108-114)。

26. 第六条第一款适用于“刑事指控”定罪的所有程序中，包括量刑程序（例如，在 *Phillips v. the United Kingdom*, § 39中，允许国家法院在下达没收令时评估没收数量的没收程序）。也可能将第六条刑事部分适用于拆迁没有规划许可的房屋而产生的程序，因为拆迁可以被认为是“惩罚” (*Hamer v. Belgium*, § 60)。然而，该部分不适用于改变最初判决使之与更有利的新刑法典相适应的程序 (*Nurmagomedov v. Russia*, § 50)。

27. 有关判决执行程序-例如特赦程序 (*Montcornet de Caumont v. France* (dec.))，假释程序(*A. v. Austria* (dec.))，根据“移交被判刑人士公约”规定的移送程序(*Szabó v. Sweden* (dec.))- 反之，见， *Buijen v. Germany*, §§ 40-45, 鉴于该案的特殊情形) – 和有关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没收令的许可程序(*Saccoccia v. Austria* (dec.))不落入第六条刑事事项范围内。

28. 原则上，没收措施在没有其他刑事诉讼的情形下严重影响第三方的财产权，但不意味着能“刑事定罪”（在 *Air Can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54中，没收一架飞机；以及在 *AGOSI v. the United Kingdom*, §§ 65-66中没收金币）。取而代之，这些措施由第六条民事事项规制(*Silickienė v. Lithuania*, §§ 45-46)。

29. 原则上，第六条的保障适用于针对法律问题的上诉程序 (*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40)，以及宪法程序(*Gast and Popp v. Germany*, §§ 65-66; *Caldas Ramírez de Arrellano v. Spain* (dec.))。因为这些程序是相关刑事程序的继续并且其结果可能对罪犯有决定影响。

30. 最后，第六条不适用于再审程序，因为判决已成终局，而就案件申请再审的人未被“指控”为条约意义下的“刑事罪行” (*Fischer v. Austria* (dec.))。只有批准再审后的新程序能被认为与决定刑事罪名有关(*Löffler v. Austria*, §§ 18-19)。同样的，第六条不适用于法院裁定违法后重起刑事程序的要求(*Öcalan v. Turkey* (dec.))。然而，导致最终判决改判的审判监督程序落入第六条刑事事项下(*Vanyan v. Russia*, § 58)。

II. 一般保障

第六条第一项

“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理由受到依法设立法院的.....公平.....的审讯.....”

A. 接触法院的权利

31. 刑事案件中接触法院权利的绝对性并不多于民事案件。它有许多潜在的限制 (*Deweere v. Belgium*, § 49; 同时见 *Kart v. Turkey* [GC], § 67)。

32. 然而，这些限制不能以某种方式或者在某种本质上导致权利受损的程度来约束权利的行使。它们必须基于合法的目的，且方式的运用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必须存在合理比例(*Guérin v. France* [GC], § 37, 和 *Omar v. France* [GC], § 34, 引自民事案件参考文献)。

33. 接触法院权利的限制可能源于：

议会豁免权：两种类型（无责任和不可侵犯）的议会豁免权所提供的保障服务于同样的需求- 保障议会履行其职权的独立性。毫无疑问，议会豁免权的不可侵犯有助于实现议会的完全独立，它通过杜绝带有政治动机而启动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从而保护反对派免受多数派的施压和权力滥用(*Kart v. Turkey* [GC], § 90, 引自民事案件参考文献)。

此外，向议员提起诉讼可能影响到所属议会的正常运转并扰乱议会工作。这个豁免体系，构成普通法系的例外，因此能够被看作是追求合法的目的（同上，§91）

34. 然而，在没有考虑案件情形的前提下，不能得出有关议会豁免权的合法性符合公约的结论。必须确定的是议会豁免权是否以某种方式限制了接触法院的权利，从而实质上导致该权利受损。审查此项措施是否符合比例意味着要考虑维护议会完整的一般利益与取消申请人议会豁免权以便在法庭上对他的刑事指控作出答复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在审查比例问题时，法院必须特别注意案件中豁免权的范围（同上，§§ 92-93）。保护议会完整性的防护措施越少则它的理由更易令人信服（同上，§95）。因此，例如，法院认定议会成员不能放弃豁免权不意味其接触法院的权利被侵犯，因为豁免权只是刑事程序中的一个暂时的程序障碍，这一障碍受到其议会任期的限制（同上，§§ 111-113）。

35. **程序规则**，例如上诉受理条件。

36. 然而，尽管上诉权可能当然的属于法定要求，但法院在适用程序规则时应避免过度形式化以至程序的公正性受到侵害 (*Walchli v. France*, § 29)。特别严格的程序规则的适用有时可能使接触法院权利的本质受到侵害 (*Labergère v. France*, § 23)，特别是考虑到上诉的重要性以及对被判处长期监禁的申请人进行诉讼程序所存在的利害关系。

37. 接触法院的权利也可能由于程序不当而在根本上受到损害，例如，控诉官负责核实罚金刑上诉受理条件或自身越权审理上诉中实体权利而申请豁免，这时，申请人就不再可能受到由社区法官决定的相关“指控” (*Josseume v. France*, § 32)。

38. 同样情形也可能出现在宣告不予受理的裁定中。这类不予受理的裁定基于错误的理由致使交存押金数额等同于标准罚金的数量，从而使得罚金被认为已经支付进而控方终止起诉。这导致申请人一旦支付罚金，就不可能就其被指控的道路交通犯罪向“*审判庭*”提出质疑 (*Célice v. France*, § 34)。

39. 令一个案例是：申请人接触法院的权利受到过度的限制。当他就法律问题上诉时，由于不符合法定诉讼时效的规定，其上诉被宣告不予受理，而不符合法定诉讼时效的规定是由于当局未履行执行下级法院对申请人裁决的瑕疵行为导致的存在缺陷，而申请人当时正被拘留，其地点可以确定的 (*Davran v. Turkey*, §§ 40-47)。

40. **执行先前裁定的条件：**

有关逮捕令状已经发出却没有被拘留的申请人提起的有关法律问题的上诉自动导致不予受理的情形：

—就法律问题的上诉被宣告不予受理所基于的理由与申请人潜逃有关。考虑到民主社会中辩护权和法治原则的重要意义，这被认为是不合比例的制裁

(*Poitrimol v. France*, § 38; 还见 *Guérin v. France*, § 45; 和 *Omar v. France*, § 42)。

—就法律问题的上诉被宣告不予受理仅因为申请人在上诉中就判处其拘留的司法判决提出异议而其并没有被拘留。这项规则迫使申请人必须事先遵循异议判决剥夺其自由的规定，即使裁定在上诉判决作出以前不能被认为是终局或者提起上诉的期限已届满。这使得申请人承担了不合比例的负担，从而打乱了一方面有关确保司法判决得以执行的立法与另一方面接触上诉法院的权利和辩护权的行使之间的平衡 (*Omar v. France*, §§ 40-41; *Guérin v. France*, § 43)。

41. 由于未履行移交监禁的义务，同样的情形适用于丧失就法律问题的上诉权 (*Khalifaoui v. France*, § 46; *Papon v. France* (no. 2), § 100)

42. 然而，在对超速罚金提起上诉之前，要求交纳罚金的条件—这项条件的目的在于防止在道路交通犯罪领域的拖延上诉和滥诉-可能构成对接触法院权利的合法合理限制 (*Schneider v. France* (dec.))。

43其他违反接触法院权利的限制也可能产生，例如，被告基于当局虚假承诺赦免一审法院判处的刑罚而被说服撤回上诉 ([Marpa Zeeland B.V. and Metal Welding B.V. v. the Netherlands](#), §§ 46-51); 或上诉法院在被告拒绝官方指派的协助其诉讼的律师后未告知他就法律问题提起诉讼的新的诉讼期限([Kulikowski v. Poland](#), § 70)。

B. 一般保证：机构要求

公约第六条第一款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时，任何人有理由……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构的审讯……”

(1) “审判机构”的概念

44. 一个纪律或行政机构可以在第六条的自治意义之下被冠以“*审判机构*”的特性，即使国内司法系统不认为其为“*审判机构*”或“*法院*”。在本法院的判例法中，审判机构以这一语词本质上的**审判功能**而确定其特性，也就是，基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事物并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开展之后的程序。它必须满足一系列更高的要求 — 独立，特别是执行独立；公正；其组成人员的任期；程序所提供的保障 — 这之中的一些要求从第六条第一款本身就可以看出 (见 [Belilos v. Switzerland](#), § 64;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99; [Richert v. Poland](#), § 43)。

45. 授予行政机关起诉和惩罚轻微“*犯罪*”行为并不与公约矛盾，只要涉案人员能接受庭审中对他不利的任何决定且该审判庭确实提供给他第六条规定的保障措施 ([Öztürk v. Germany](#), § 56; [A. Menarini Diagnostics S.R.L. v. Italy](#))。因此，尽管行政机构并不符合公约第六条第一款的要求，但其所作出的判决必须在之后受到“**拥有完全管辖权的审判机构**”的审查。这一机构的定义特性包括就有关事实和法律的问题对下述机构判决的各方面内容都有撤销权， ([Schmutzer v. Austria](#), § 36; [Gradinger v. Austria](#), § 44; [A. Menarini Diagnostics S.R.L. v. Italy](#), § 59): 例如，行政法庭的司法审查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还详细分析了行政当局判处刑罚的适当性及合比例性 (见 [A. Menarini Diagnostics S.R.L. v. Italy](#), §§ 63-67, 有关负责竞争的独立的监管机构判处的罚金)。相同的，即使仅是法律本身根据罪行的严重性已确定责罚，司法审查就可以满足第六条规定的要求 (见 [Malige v. France](#), §§ 46-51, 有关对驾驶证进行减分)。

46. 给予一个有约束力且可能不能被任何司法机构改变的决定的权利是“*审判机构*”概念的内在本质 ([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7)。

(2) 通过法律设立的“审判机构”

47. 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审判机构必须“*通过法律设立*”。这种说法反映了法治的原则，这种说法是公约及其议定书所建立的保护体系的内在含义(见，例如，[Jorgic v. Germany](#), § 64; [Richert v. Poland](#), § 41)。事实上，不是通过法律建立起来的机构在民主社会下将会被剥夺其听取个人申诉的所需的合法性要求([Lavents v. Latvia](#), § 114; [Gorgiladze v. Georgia](#), § 67; [Kontalexis v. Greece](#), § 38)。

48. 第六条第一款意义下的“*法律*”特别包括了有关**司法机构设立和职能的法律** ([Lavents v. Latvia](#), § 114; [Richert v. Poland](#), § 41, [Jorgic v. Germany](#), § 64)，此外还包括了国内法律的其他条款，这些条款如果被违反，将会导致一名或多名法官参与案件审查行为的违

法(*Gorgiladze v. Georgia*, § 68; *Pandjigidze and Others v. Georgia*, § 104)。“通过法律设立”这个词语不仅显示了“*审判机构*”存在的法律基础,还要求“*审判机构*”符合规范其的特别规则 (*Gorgiladze v. Georgia*, § 68),同时也是对每个案件中审判庭组成的要求 (*Posokhov v. Russia*, § 39; *Fatullayev v. Azerbaijan*, § 144; *Kontalexis v. Greece*, § 42)。

49. 因此,如果一个“*审判机构*”根据所适用的国内法条款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审判被告,这不是第六条第一款意义下的“*通过法律设立*”的审判机构 (*Richert v. Poland*, § 41; *Jorgic v. Germany*, § 64)。

50. 第六条下“*通过法律设立*”这一术语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民主社会下的司法机构不依赖于行政裁量,而是由议会制定的法律规制”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98; *Richert v. Poland*, § 42)。在那些法律被编纂的国家,不能由司法机构自行决定司法体系,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完全没有解释相关国内法律的自由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98, *Gorgiladze v. Georgia*, § 69)。

51. 原则上,审判机构违反国内法律有关司法机构设立和职能的条款可能导致对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违反。法院因此有权利审查国内法律在这方面是否符合规定。然而,考虑到一般原则所规定的首先需由国内法院自身来解释国内法律条款,法院可能不会质疑它们的解释除非解释公然违反国内法律(见,比照,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98 案件中的罚金, and *Lavents v. Latvia*, § 114)。因此,法院的任务限于审查是否存在合理理由使机构建立管辖权(见,特别是, *Jorgic v. Germany*, § 65)。

52. 法院认定有关机构并非“*通过法律设立的审判机构*”的案例:

— 最高法院在相关规定并非通过法律设立的情况下,审判同案犯的其他罪行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107-108);

— 在特定案件中,由两个选举出来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违反了法规规定的由抽签决定法官和每年最多服务两周的要求 (*Posokhov v. Russia*, § 43);

— 由陪审员组成的法庭,而这些陪审员按照已建立的传统审理案件,尽管有关陪审员的法律已经被废止而新法律仍未制定 (*Pandjigidze and Others v. Georgia*, §§ 108-111);

— 法院的组成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为审理案件的法官已被取消资格 (*Lavents v. Latvia*, § 115)。

53. 法院认定下列案件中的审判机构为“*通过法律设立*”:

— 一个德国法庭审判一个人在波斯尼亚犯下的种族灭绝行为 (*Jorgic v. Germany*, §§ 66-71);

— 建立的特殊法庭审理腐败案件和组织犯罪 (*Fruni v. Slovakia*, § 140)。

(3) 独立和公正

54.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要求案件由依法设立的“*独立和公正的审判机构*”进行审理。独立的概念和客观公正的概念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正因为此,法院通常将这两个条件合并考量(*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3)。

当决定“*审判机构*”是否是“*独立和公正*”时,这些原则将被适用。同时这些原则将不区分职业法官和陪审员,同等适用。

(A) 独立的审判机构

1. 一般原则

55. 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要求独立于其他权力分支机构-即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以及当事人双方 ([Ninn-Hansen v. Denmark](#) (dec.))。

56. 尽管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权力分立的理念在法院判例法中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第六条和公约其他条款并不要求国家遵守任何理论性的有关权力互动限制的宪法理念。在一个案件中，问题总是在于判定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要求([Henryk Urban and Ryszard Urban v. Poland](#), § 46)。

2. 评估是否独立的标准

57. 在决定一个机构是否能被认为是独立的时，法院考虑下列标准 ([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3):

- 其成员的任命方式和他们的任职期间；
- 抵抗外界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存在；
- 机构是否呈现独立的外观。

(i) 机构成员的任命方式

58. 不能仅凭法官是由议会任命而对他们的独立性产生疑问 ([Filippini v. San Marino](#) (dec.)); [Ninn-Hansen v. Denmark](#) (dec.))。

59. 同样的，行政机构任命法官是允许的，前提是被任命的人在履行其司法职能时不受影响或压力 ([Henryk Urban and Ryszard Urban v. Poland](#), § 49;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79)。

60. 尽管将一个案件交由一个特殊的法官或法院审理属于国内机构自由裁量的范围，但法院必须确信这种情形是符合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特别是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要求 ([Moiseyev v. Russia](#), § 176)。

(ii) 机构成员的任职期间

61. 任期没有规定要有一个必要的最低限度。法官任职期间不被免职一般须被认为是其独立性的延伸。然而，法律上对不被免职不存在正式的规定这一情形本身并不意味着缺乏独立性，只要实际情形下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存在其他必要的保障措施([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80)。

(iii) 抵抗外界压力的保障措施

62. 司法独立要求法官个人免受来自司法系统内外的不适当的影响。内部的司法机构独立要求法官免受共事法官或那些在法院内有行政职务的人-诸如法院院长或法院审判庭庭长的指示或压力。在司法系统内，特别是涉及上一级司法机构时，缺乏对法官独立的充分保护可能导致法院得出的结论是：申请人对法院独立和公正的怀疑可能被认为是客观合理的([Parlov-Tkalcic v. Croatia](#), § 86; [Daktaras v. Lithuania](#), § 36; [Moiseyev v. Russia](#), § 184)。

(iv) 独立的外观

63. 决定一个“*审判机构*”是否能被认为符合第六条第一款下所要求的独立，外观可能也很重要。考虑的重点是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是民主社会下法院必须要鼓励包括被告在内的公众树立的，当涉及到刑事程序时这种信心则更为重要([Sahiner v. Turkey](#), § 44)。

64.在确定是否存在合理理由质疑某一法院缺乏独立性或公正性时，被告的立场是重要的但非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怀疑是否能被认为是客观合理的([Incal v. Turkey](#), § 71)。当法院认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就案件目前情况来看没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时，独立性就不存在问题([Clarke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65.当“*审判机构*”的成员包括在职责上和服务的组织上属于从属职位的人员，而这些人员又与一方当事人相关时，被告对这些人员的独立性的怀疑可能就是合理的 ([Şahiner v. Turkey](#), § 45)。

(B) 公正的审判机构

66.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要求落入其范围的“*审判机构*”是公正的。公正性通常指的是不存在偏见，是否存在公正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测试([Kyprianou v. Cyprus](#) [GC], § 118; [Micallef v. Malta](#) [GC], § 93)。

1. 评估公正性的标准

67. 法院区分了两种方式

- 主观方式，即试图确定某一案件中所给定的法官的个人信念或兴趣；
- 客观方式，即判定他或她是否提供足够保障来排除有关该方面的任何合理怀疑

([Kyprianou v. Cyprus](#) [GC], § 118; [Piersack v. Belgium](#), § 30; and [Grievé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69)。

68. 然而，两个概念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区分。因为法官的行为不仅能通过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快速客观地得出其公正性存在问题（客观测试），也可以讨论他或她的个人信念问题（主观测试）。因此，一个案件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检验取决于争议行为的具体事实([Kyprianou v. Cyprus](#) [GC], § 119 和121)。

(i) 主观方式

69. 在适用主观测试时，法院一贯认为除非有相反证明，否则应认定法官个人的公正性([Kyprianou v. Cyprus](#) [GC], § 119; [Hauschildt v. Denmark](#), § 47)。

70. 至于所要证明的情形，举例来说包括：法院试图确定一个法官是否有敌对情绪或者恶意或者法官是否因个人原因将某一案件交由自己进行审判 ([De Cubber v. Belgium](#), § 25)。

71. 尽管在一些案件中获取有关推翻法官主观公正的推定的证据可能很困难，客观公正提供了重要的进一步保障。事实上，法院已经意识到根据主观公正性来确立违反第六条的困难性。因此，法院在大部分案件中都主要运用客观测试([Kyprianou v. Cyprus](#) [GC], § 119)。

(ii) 客观方式

72. 根据客观测试，当将其运用到合议庭的某一主体时，必须判定是否存在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的确切事实，这一测试完全不同于评估任一成员的个人行为 ([Castillo Algar v. Spain](#), § 45)。

73. 在决定一个给定案件中是否存在合理理由质疑某一主体缺乏公正性时，那些声称是不公正的立场是重要的但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怀疑是否能被认为是客观合理的([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 58; [Padovani v. Italy](#), § 27)。

74. 客观测试主要涉及法官和程序中其他相关人员的层级关系或者其他联系。通过客观测试，使得对审判机构公正性的质疑得到客观的确认，从而确定审判机构不符合公约

规定的标准(见 [Micallef v. Malta](#) [GC], § 97)。因此, 每个个案需要判定的是相关的关系是否在本质上和程度上显示出“*审判机构*”缺乏公正性([Pulla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75. 基于此, 即使是外观也可能存在一定重要性。考虑的重点是公信力, 而这种公信力是民主社会下法院必须要鼓励包括被告在内的公众树立的。因此, 当存在合理理由质疑任一法官的公正性时, 其就必须回避(见 [Castillo Algar v. Spain](#), § 45)。

76. 还必须考虑的是内部组织的问题 ([Piersack v. Belgium](#), § 30(d))。是否存在确保公正性的国内程序, 即法官回避的规定, 是一个相关考量因素。这种规定显示出国内立法机构希望通过排除对相关法官或法院公正性的所有合理怀疑并试图通过消除担忧的产生而确保公正性。除了确保没有实际的偏见外, 它们还注重消除偏见的所有外观表现以确保公信力, 而这种公信力是民主社会下法院必须鼓励公众树立的(见 [Micallef v. Malta](#) [GC], § 99; [Meznaric v. Croatia](#), § 27; [Harabin v. Slovakia](#), § 132)。法院在评估“*审判机构*”是否公正时, 特别是在评估申请人的质疑是否客观公正时将会考虑这些规则(见 [Pfeifer and Plankl v. Austria](#), § 6; [Oberschlick v. Austria](#) (no.1), § 50, 并且比照, [Pescador Valero v. Spain](#), §§ 24-29)。

2. 可能导致司法公正性问题产生的情形

77. 导致司法公正性问题产生的两种可能情形 ([Kyprianou v. Cyprus](#) [GC], § 121):

— 第一是**职能的性质**和相关性, 例如, 司法程序过程中同一人履行不同的职能, 或程序中与其他相关人员有**层级关系或者其他关系**;

— 第二是基于**个人的性格**以及来自给定案件中法官的行为。

(i) 职能的性质的情形

a. 履行不同的司法职能

78. 仅凭刑事庭法官也参与了案件包括拘留候审在内的审前决定的事实不能被认为是对他缺乏公正性的合理质疑; 重要的是参与这些决定的程度和决定的性质 ([Fey v. Austria](#), § 30; [Sainte-Marie v. France](#), § 32; [Nortier v. the Netherlands](#), § 33)。当有关犯罪问题的决定包括拘留候审的决定满足“一个非常高的清晰度”, 法院认为相关“*审判机构*”的公正性能够产生怀疑同时申请人就此事的质疑可以被认为是客观合理的([Hauschildt v. Denmark](#), §§ 49-52)。

79. 法官曾是检察部门人员的事实不构成质疑其缺乏独立性的理由; 然而, 如果一个人, 在该类部门中任职并根据职务的特质他可能要在职责范围内处理一个给定的案件, 但之后他又作为同一案件的法官, 那么公众有权利质疑他没有提供充分的公正性保障 ([Piersack v. Belgium](#), § 30(b) and (d))。

80. 相继的履行调查职能的法官和审判职能的法官在同一案件中为同一人的情形也会让法院认为审判庭的公正性能够使申请人产生怀疑 ([De Cubber v. Belgium](#), §§ 27-30)。

然而, 当审判法官对调查过程的参与受到时间的限制并存在两个目击证人, 同时没有任何对证据的评估也不要求其得出结论时, 法院认为申请人有关国内法院缺乏公正性的质疑不能被认为是客观合理的([Bulut v. Austria](#), §§ 33-34)。

81. 当法官在程序的其他阶段已作出完全正式判决和程序性决定时, 缺乏司法公正性的问题将不存在; 然而, 如果在程序的其他阶段法官针对被告是否有罪发表观点时, 就可能产生公正性问题 ([Gómez de Liaño y Botella v. Spain](#), §§ 67-72)。

82. 仅有法官对于相似但不相关的刑事指控作出判决或他/她已在独立的刑事程序中对同案犯进行审理的事实不足以对法官在之后案件中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Kriegisch v.](#)

[Germany](#) (dec.)); [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 544)。然而，包含对被告有罪的问题做出实际预判的调查结果，情形则略有不同 ([Poppe v. the Netherlands](#), § 26; [Schwarzenberger v. Germany](#), § 42; [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 59)。

83. 公正的义务不能理解为针对上级法院撤销行政或司法判决，从而将案件移交给另一管辖法院或者该机构的另一分支部门来施加义务 ([Thomann v. Switzerland](#), § 33; [Stow and Gai v. Portugal](#) (dec.))。

β 程序中与另一参与者的层级关系和其他关系

层级关系

84. 军事法庭对军队服役人员的刑事指控作出的决定原则上符合第六条条款的规定 ([Cooper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10)。然而，如果军事法庭的所有成员都下属于某一军官并服从于其指挥，则申请人有关审判机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怀疑是客观合理的 ([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6; [Miller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30-31)。

85. 审判普通公民的法庭的组成有部分是武装部队的成员可能构成合理质疑，因为法院自身可能受到部分因素的过度影响 ([Incal v. Turkey](#), § 72; [Ibrahim Ülger v. Turkey](#), § 26)。即使在针对公民诉讼的案件中，当军事法庭的法官仅参与了后续仍然有效的中间决定时，整个程序将不存在由独立公正的法院作出决定的外观 ([Öcalan v. Turkey](#) [GC], § 115)。

86. 当军事法庭对普通公民对抗武装部队的行为进行管辖时，对这类法庭的客观公正性可能存在合理怀疑。授权军事法庭审判非武装部队成员的司法体系很可能会消除本应在法院与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存在的距离，即使存在充分的保障措施来保证法庭的独立性 ([Ergin v. Turkey](#) (no. 6), § 49)。

87. 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由军事法庭确定普通公民的刑事指控能被认为是符合第六条的规定 ([Marti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4)。

其他关系

88. 审判法庭庭长的公正性存在客观合理怀疑当她的丈夫是处理申请人案件的调查队负责人 ([Dorozhko and Pozharskiy v. Estonia](#), §§ 56-58)。

89. “审判机构”的成员认识案件中某一证人这一情形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他将会更偏向于这一证人的证言。在每个案件中，必须判定的是这种相互熟悉的关系是否在本质上和程度上使审判机构的部分组成人员丧失公正性 ([Pulla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有关陪审团中有一名陪审员是一个关键的控方证人的雇员; [Hanif and Kh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141, 有关陪审员中有警察人员)。

(ii) 个人的本质

90. 为了保有其公正法官的形象，司法机构被要求就其处理的案件行使最大自由裁量权。这项自由裁量权要求他们即使在被激怒的时候也要避免使用媒体，从而对正义以及司法机关的高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Buscemi v. Italy](#), § 67; [Lavents v. Latvia](#), § 118)。因此，当法院院长在主持法庭进行判决之前公开表示他对案件已形成了不利于申请人的观点时，他的言论使被告对其公正性的质疑客观合理化 ([Buscemi v. Italy](#), § 68; 同时见 [Lavents v. Latvia](#), § 119, 法官参与针对辩方的公开评论并公开表达其对被告申请无罪辩护感到吃惊)。

91. 就审判发生时的政治环境，政府提出的立法改革以及辩方的策略，一群国家法律服务人员向媒体发表言论批评，国家法官和检察官协会公开发布报告评论，但都没有做出被告人有罪的宣称，此时这一行为不构成对第六条的违反。此外，审理申请人案件

的法庭完全是由专业的法官组成的，而这些专业的法官所有的经验和所受过的培训使他们能够免受外部影响（[Previti v Italy\(dec\)](#), §253）。

C. 一般保障：程序要求

(1) 公平

第六条第一款

“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理由……受到依法设立的法院的公平……审讯”

(A) 两造平等和对抗制程序

92. 两造平等是公正审讯的本质特征。它要求每个当事人都能被给予一个合理的机会陈述其案件以使他，和对立方相比，不被置于一个实质上不利的地位（[Foucher v. France](#), §34; [Bulut v. Austria](#); [Bobek v. Poland](#), §56; [Klimentyev v Russia](#), §95）。两造平等要在当事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这一原则在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中同等适用。

93. 对抗制庭审权利指的是原则上双方当事人都有机会就引用的证据或者影响法庭判决的勘查意见进行了解以及发表评论获得对抗制庭审的权利与两造平等密切相关。事实上，在一些案件中，法院将两个概念合并考量后发现存在对第六条第一款的违反。

94. 法院的案例法存在着重大的演变，其中比较显著的是外观的重要性和公众对司法机构公正性的敏感度与日俱增（[Borgers v. Belgium](#), §24）。

95. 在刑事案件中，第六条第一款与第六条第三款的特殊保障措施有重叠，尽管第一款不限于第三款列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事实上，第六条第三款包括的保障措施是第六条第一款列出的公平审讯概念的构成要素。

1. 两造平等

96. 对辩护权的限制在[Borgers v. Belgium](#)案中可以找到。在该案中，拒绝申请人在上诉之前就法律顾问递交的申请发表意见，并且事先也没有收到该申请的复印件。而之后法庭顾问以意见员的身份参与法官评议加重了这种不平等。

97.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被要求等待15个小时才能最终在凌晨获得对案件进行辩护的机会，法院认为这中情形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和第六条第三款（[Makhfi v. France](#)）。同样的，法院发现最高院裁决刑事案件违反了两造平等的原则。被定罪的申请人进行上诉并要求现场出席，但却被排除在秘密进行的初审之外（[Zhuk v. Ukraine](#), §35）。

98. 相反的，申请人控诉对比双方当事人位置，检察人员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违反了两造平等，这被认为缺乏明显根据而被宣告不予受理。就保护其利益来说，被指控的人并没有被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Diriöz v. Turkey](#), §25）。

99. 在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没有法律规定可能违反两造平等的规定，因为它们的目的在于防止权力滥用以保护被告。因此，遗漏或者缺乏清晰的相关规定，被告最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102）。

100. 控方证人和被告的证人必须同等对待；然而，是否存在违反两造平等的情形依赖于证人是否实际享有特权地位（[Bonisch v. Austria](#), §32，反之，见，[Brandstetter v. Austria](#), §45）。

101. 不像被告披露证据可能违反两造平等（也违反对抗制审讯的权利）（[Kuopila v. Finland](#), §38, 被告就警方的补充报告发表意见）。

102. 基于公共利益，被指控的人被限制查阅案件档案和其他资料，此时也可能存在违反两造平等（[Matyjek v. Poland](#), §65）。

2. 对抗制审讯

103. 公正诉讼权的基本要求是：刑事诉讼，包括涉及程序的刑事诉讼中的要素，应当是**对抗性的**；同时控辩双方间**两造平等**。对抗制诉讼的权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都都有机会对另一方的评论和采用的证据进行了解和发表评论。此外，第六条第一款要求控诉方应向被告披露其掌握的所有证据材料，包括对被指控的人有利的和不利的（[Rove and Dav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60）。

104. 在刑事诉讼中，第六条第一款经常与第六条第三款下的被告权利重叠，比如询问证人的权利。

105. 如果出现基于公共利益而向被告隐瞒证据的情形，在特定的案件中，法院自身将不会审查不披露的指令是否合理。取而代之的法院将审查决策程序来确保这符合对抗制程序、两造平等，保护被告方利益的保障措施的要求。

106. 在[Rowe and Dav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案中，由于控诉方在法官庭审时没有就争论问题提供证据并准许就披露证据问题自我裁定，法院认为这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剥夺了申请人公正诉讼权。然而，在[Jasper v. the United Kingdom](#) [GC](§58)案中，没有被披露的材料不是被控案件的组成部分，也没有向陪审员展示。基于这样的事实，法院并不认为这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107. 然而，有权获得相关证据不是一项绝对权。在刑事程序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例如国家安全，需保护证人免受报复危险，或对警察调查犯罪的方法需保密，这些都**必须**与被告人的权利进行权衡。在一些案件中，可能需要就某些证据对被告保密以保障第三人的基本权利或保障重要的公共利益。然而，这些限制被告权利的措施只有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使用才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58）。此外，为了保证被起诉的人享有公正的审讯，任何给被告造成的困难的限制权利的措施都必须通过司法机构开展相关程序进行充分的权衡（[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72;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54）。

108. 在[Edwards and Lew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案中，申请人被拒绝获取相关证据因而导致他们的辩护人不能就诱捕案件在庭前进行充分的辩论。因此，法院认为这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为决定是否披露证据和有关诱捕的程序不符合对抗制程序和两造平等的要求，且其也没有充分的保护措施来保护被告利益。

109. 对对抗制诉讼权的违反也存在于如下情形中：当事人在审讯之前没有收到报告法官的报告而法庭顾问却收到了，也没有就会就法庭顾问递交的申请发表意见（[Reinhardt and Slimane-Kaïd v. France](#), §§ 105-106）。

(B) 司法判决的理由

110. 根据已建立的判例所反映出来的公正司法原则，法院和审判庭的判决必须说理充分（[Papon v. France](#) (dec.))。

111. 说理充分的判决显示出双方的理由都被法庭充分听取，从而使双方更容易接受判决。此外，说理充分的判决还要求法官根据客观的论据来说理并要求保证被告的权利。

然而，说理义务的范围应基于判决的本质和案件的具体情形而有相应的变化([Ruiz Torija v. Spain](#), § 29)。

112. 尽管法院不需要就每个提出的论点给以答复 ([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 61)，但案件中的必要问题必须在判决中有清晰的说明(见 [Boldea v. Romania](#), § 30)。

113. 国内法院应就其判决所基于的理由给以清晰的说明，从而使当事人能够有效行使任何可能的上诉权利 ([Hadjianastassiou v. Greece](#); and [Boldea v. Romania](#))。

1. 陪审团作出决定的理由

114. 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很少就其决定给以理由，因此就此行为的公正性问题在一些案件中被提出。之前的人权委员会和现在的法院都遇到过此类案件。

115. 公约并不要求陪审员就其决定说明理由；第六条也不排除被告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即使陪审团不能就判决给出理由 ([Saric v. Denmark](#) (dec.))。然而，要满足公正诉讼权的规定，被告和公众必须能理解所给的判决；这是反对恣意判决的重要保障([Taxquet v. Belgium](#) [GC], § 92; [Legillon v. France](#), § 53)。

116. 在巡回法院由陪审团组成的情况下，尽管陪审员时常不要求-或不准-就他们给出的判决给出理由，但仍必须符合特殊的程序规则。在这些情形下，评估是否存在充分的保障措施以避免恣意判决并使得被告理解对他的定罪理由。这类程序保障措施可能包括，例如：主审法官就涉及的法律问题向陪审员提供的方向或者指导，采用的证据，以及法官向陪审员明确提出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判决框架或者完全抵消陪审员无法就其结论提供理由的事实（见 [R.v Belgium](#) (dec.), [Zarouali v. Belgium](#) (dec.), [Planka v. Austria](#) (dec.) 和 [Papon v. France](#) (dec.))。就是否存在加重情节这一情形时，当巡回法院拒绝向每一个被告分开提问，并由此不准陪审团决定申请人个人的刑事责任，法院认为这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Goktepe v. Belgium](#), § 28)。

117. 在 [Bellerin Lagares v. Spain](#) (dec.) 案中，法院观察到被非难的判决-附有陪审团的审议记录-含有陪审团得出申请人有罪的事实列表，有对事实的法律分析，同时出于量刑的目的判决还提及所发现的对申请人在案件中罪责程度有影响情形。基于此，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法院认为存在争议的判决已涵盖足够理由。

118. 必须要有供被告上诉的途径 ([Taxquet v. Belgium](#) [GC], § 92)。在 [Taxquet v. Belgium](#) [GC] 案件中，只有四个问题涉及申请人；且这四个问题的措词与向其他共同被告提出的完全一致，同时不许他决定定罪的事实或法律基础。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何被判有罪的情形构成不公正审判 (§ 100)。

119. 在 [Judge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案中，苏格兰审判系统是陪审团只要给出无理由的判决即可，法院认为这一审判系统足以使被告理解其被定的罪行。此外，法院认为苏格兰法律规定的上诉权足以弥补陪审团所做的任何不适当的判决。根据适用的相关法律，上诉法院享有广泛的审查权，可以推翻任何不公正的判决。

(C) 保持沉默权与不自证其罪权

1. 确认及适用范围

120. 任何被指控刑事犯罪的人有保持沉默以及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Funke v. France](#), § 44; see also [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45; [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0)。尽管第六条没有明确指出该权利，但保持沉默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是第六条公正程序的核心概念。通过使被告免受当局的不正当强

制措施，这些保护措施可以防止误判，确保第六条的目的得以实现([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

121.不自证其罪的权利适用于所有犯罪（包括最简单的和最复杂的犯罪）的刑事程序([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74)。

122. 嫌疑犯被警察询问之时，保持沉默的权利即可被适用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

2. 范围

123. 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假定在刑事案件中，控方不应该用违背被告意志的胁迫方式获得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 ([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8; see also [Bykov v. Russia](#) [GC], § 92)。

124. 然而，在刑事程序中使用的资料是通过强制获得但独立于被告意志（例如，根据搜查令获取的文件，为做DNA测试而获取的呼吸、血液和尿液样本和身体组织）时，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不适用 ([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9; see also [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47)。

125. 尽早接触律师是程序性保障的一部分，当审查程序是否本质上损害不自证其罪权利时，法院会特别考虑这一点为了使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正诉讼的权利保证实际有效，获得律师的权利，作为一项规则，应在接受警察首次讯问时就可获得，除非案件的具体情形表明存在迫不得已的原因需要约束该权利 ([Salduz v. Turkey](#) [GC], §§ 54-55)。

126. 被警方拘留的人同样享受不自证其罪保持沉默的权利以及在被讯问时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放弃其中一项权利并不导致对其他权利的放弃。而与此同时，这些权利又是互补的，因为当警方没有事先告知这些被拘留的人保持沉默的权利时，那么他们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就更需要得到保障([Navone and Others v. Monaco](#), § 74; [Brusco v. France](#), § 54)。告知嫌疑犯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没有直接告知其保持沉默的权利或者其在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那么即使被告已知供述可能被用做对他不利的证据时仍同意向警方供述，他的供述仍然不能认为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Navone and Others v. Monaco](#), §74; [Stojkovic v. France and Belgium](#), §54) 。

127. 保持沉默的权利以及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主要是为了保护嫌犯在被警方讯问时有选择陈述或保持沉默的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显然受到了损害：嫌犯选择在讯问时保持沉默而警方以欺骗的方式诱导嫌疑犯从而获得他们在讯问时无法获得的嫌疑犯的招供和有罪供述（一个特别的情形是，通过警方在申请人的牢房中安排线人从而获得的嫌疑犯的招供）；随后这些招供和有罪供述在庭审中被作为证据引用([A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50)。

128. 相反的情况是，在[Bykov v. Russia](#) [GC]案件中，申请人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压力和胁迫，也没有被拘禁，并且有选择是否见警方线人以及和其谈话的自由。此外，在审讯中，聊天记录并没有被当作他所做的招供，也没有将其作为判定其有罪的核心要素；且这一证据在法院所评估的众多证据中影响甚微(§§ 102-103)。

3. 一个相对的权利

129. 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7)。

130. 在审查某一程序是否破坏了不自证其罪的权利的本质时，法院对于如下要素将给以特别的考量：

—强制的性质和程度；

—程序中是否存在任何相关的保障措施；

—获得的任何材料的使用方式 ([Jalloh v. Germany](#) [GC], § 101; 也可见 [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55; [Bykov v. Russia](#) [GC], § 104)。

131. 一方面，定罪不能仅依据或主要依据被告的沉默，拒绝回答问题和提供证据。另一方面，保持沉默的权利不能阻止控诉方用被告的沉默—在明显需要他提供解释的情况下——来支持所援引的证据。因此，被告所做的在整个刑事程序中保持沉默的决定不能认为一定对案件没有影响。

132. 通过被告的沉默作出不利于被告的推论是否违反第六条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尤其要考虑到国内法院在评估证据以及强制的程度时对这类推论依赖的程度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7)。

133. 此外，需考虑到有关调查和惩治一些特殊犯罪的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这有时比合法获得证据以保护个人利益更为重要。但当采取的措施破坏了申请人辩护权（包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的本质时，即使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这类措施也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 ([Jalloh v. Germany](#) [GC], § 97)。在审判程序中，不能基于公共利益而使通过强制非司法调查获得的被告的有罪供述正当化 ([Heaney and McGuinness v. Ireland](#), § 57)。

(D) 非法或违反公约权利使用证据

134. 尽管第六条保障公正审讯的权利，但它并没有对证据采纳规则作出任何规定，而这是国内法律主要规制的方面 ([Schenk v. Switzerland](#), §§ 45-46; [Heglas v. the Czech Republic](#), § 84)。

135. 因此，原则上来说，法院不决定某类证据-例如，违反国内法律非法获得的证据-是否可采纳。但法官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程序-作为一个整体，包括获得证据的方式-是否是公正的。这就要求审查涉嫌违法的问题；当涉及其他公约权利的违反时，还要审查所发现的违反权利的本质情况 ([Kh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34; [P.G. and J.H. v. the United Kingdom](#), § 76; [A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2)。

136. 在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程序是否公正时，必须考虑辩护权是否得到尊重。尤其要审查申请人是否有质疑证据真实性并反对使用该证据的机会。此外，也必须考虑证据的质量，比如必须考虑获得证据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在这些情况下获得的证据其可靠性和准确性是否有待考察。尽管获得的证据没有其他材料印证并不一定会存在公正性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当证据的证明力非常强且其不存在证据不可靠的风险时，那么对其他辅助性证据的需要就相对较小 ([Bykov v. Russia](#) [GC], § 89; [Jalloh v. Germany](#) [GC], § 96)。就此方面来说，法院需要特别注意考察存在争议的证据是否对刑事程序的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 ([Gäfgen v. Germany](#))。

137. 至于审查违反公约的本质，问题在于将违反第八条获得的信息作为证据使用是否与公约第六条背道而驰，从而导致整个审判的不公正，这需要考虑整个案件的情形，特别是考虑尊重申请人辩护权问题和证据的质量和重要性的问题后再行决定 ([Gäfgen v. Germany](#) [GC], § 165)。

138. 然而，使用违反第三条获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需给以特别的考量。这些证据是通过违反公约所保障的核心权利和绝对权利之一而获得的，即使在定罪中所采纳的这些证据并不是关键证据，使用这类证据仍会导致程序公正出现严重的问题 ([Jalloh v. Germany](#) [GC], §§ 9 和 105; [Harutyunyan v. Armenia](#), § 63)。

139. 因此，在刑事程序中使用通过违反第三条而获得的供述—不论受到的对待是酷刑、非人道待遇还是有损人格的待遇—会自动导致整个程序的不公正，进而违反第六条（[El Haski v. Belgium](#); [Gäfgen v. Germany](#)[GC], §166）。前述规定同样适用于使用的证据是通过酷刑而获得的（[Jalloh v. Germany](#)[GC], §105; [Gäfgen v. Germany](#)[GC], §167）。然而，当证据是通过违反第三条的非人道待遇但尚不及酷刑的行为而获得时，对这类证据的采纳只有在表明对第三条的违反是为了使程序对被告不利，也即对被告的定罪或判刑有影响时，才构成违反第六条（[El Haski v. Belgium](#), §85; [Gäfgen v. Germany](#)[GC], §178）。

140. 上述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受到违反第三条对待的人是被告的情形，也适用于相关第三方（[El Haski v. Belgium](#), §85）。特别是，当法院发现在审判中所使用的证据是通过酷刑而获得的，那么即使这类证据是通过第三方审讯而取得的，也被认为是对公正司法的公然否认（[O 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tied Kingdom](#), §§263 和267）。

(E) 引诱犯罪

1. 一般考量

141. 法院承认当局使用特殊方法进行调查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组织犯罪和腐败案件中。在这一点上，法院同意使用特殊调查方法-特别是秘密手段-本身并不侵害公正诉讼权。然而，考虑到这类技术可能存在警察引诱犯罪的风险，对这类技术的使用就必须有明确的界限范围（[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51）。

142. 尽管组织犯罪的出现要求国家采取适当的措施，然而从公正司法的要求中得出的公正审判权仍适用于任何刑事犯罪，包括最简单的案件和最复杂的案件。公正司法的权利在民主社会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不能因为便利而牺牲该权利（同上，§53）。

143. 此外，尽管公约不排除在初始调查阶段或者根据案件性质使用诸如来自匿名人的情报，但审判庭在之后使用这类情报确定罪名则是另一个问题（[Teixeira de Castro v. Portugal](#), §35）。只有在存在足够充分的保障以防止滥用，特别是存在明确可预见的程序来授权、实施以及监管存在争议的调查措施时，才允许使用这类证据（[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51）。至于当局控制卧底行动，法院认为，尽管司法监督可能是最适当的方式，只要存在其他适当的程序和保障措施(例如受到检察官监管)，其他方式也可被使用（[Bannikova v. Russia](#), §50）。

144. 尽管当存在严格的限制条件和保障措施时使用卧底特工是可行的，但公共利益的理由不能使使用通过警察引诱而获得的证据正当化，因为这可能从开始阶段就存在着完全剥夺被告公正审判权的风险（[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54）。

145. 因此，为了确定公正诉讼的权利是否在涉及使用卧底特工的案件中得到尊重，法院要审查的是：首先，是否有引诱（“对引诱犯罪的实质性测试”）；以及，如果有，申请人是否可以在国内法院就引诱行为进行辩护（[Bannikova v. Russia](#), §§37 和 51）。不论特工是受雇于国家还是只提供帮助的私人，如果他/她的行动构成了引诱并将基于此而获得的证据在刑事程序中作为对申请人不利的证据而使用，那么法院将为认为这违反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73）。

2. 引诱的实质测试

146. 法院定义引诱犯罪 (Entrapment)²为在官方人员涉入的情形下——不论他是安全部队中的一员还是听从其指挥的个人——为了使罪名得以成立，并不局限于消极的调查犯罪活动，而是对犯罪主体施加影响进而诱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行为，从而获得证据进而提起控诉 (*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55)。

147. 在决定调查是否是“必要的消极的”时，法院审查隐蔽行动以及当局实施的行为背后的理由。法院尤其要决定对申请人参与犯罪活动或者有犯罪的倾向的怀疑是否客观 (*Bannikova v. Russia*, §38)。

148. 法院在对此进行评估时，会考虑一系列因素。例如，在早期有重要影响的 *Teixeira de Castro v. Portugal* 案件中，法院特别考虑了如下事实：申请人没有犯罪记录，有关他的情况没有展开调查，警察不了解他，在他家中未发现任何药物，以及被拘留期间在他身上发现的药物的数量不及卧底特工所认为的数量。法院发现那些特工的行为已经超过了卧底特工的行为界限，他们煽动他人犯罪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他们不干涉的情况下犯罪可能会发生 (§§37-38)。

149. 有犯罪记录本身并不表明有犯罪的倾向 (*Constantin and Stoian v. Romania*, §55)。然而，申请人对目前药品的价格非常了解，他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获得药品的能力，以及尽管存在很多取消交易的机会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这些情形被法院认为是预先存在犯罪活动或意图的迹象 (*Shanno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150. 另一个需要被考虑的因素是申请人是否被迫犯下罪行。没有客观迹象表明申请人参与刑事活动或有犯罪的倾向而主动联系申请人 (*Burak Hun v. Turkey*, §44)，尽管遭到申请人拒绝仍然再行倡议，不断鼓动 (*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67)，提出超出平均水平的价格 (*Malininas v. Lithuania*, §37) 以及通过提及脱瘾症状来博取申请人的同情 (*Vanyan v. Russia*, §§11和49)，上述行为，不论实施的特工是安全部队的成员还是听从其指挥的个人，都被法院认为是迫使申请人犯下所争议罪行的情形。

151.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特工是否能被认为“参与”或者“渗入”到犯罪活动中而非发起犯罪活动。如果是前者的情况，争议的行动仍然在卧底工作范围之内。在 *Miliniéné v. Lithuania* 案中，法院考虑到，尽管警察影响了事件的进程，主要是为私人提供技术设备以便对话录音以及为申请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但他们的行动仅能被认为是“参与”了犯罪活动而非发起，因为是案件中的这个人发起了犯罪活动。后者曾向警方控诉申请人要求通过贿赂以获得对其有利的案件结果，为了验证控诉的真实性，相关措施需要由副检察长授权和监督 (§§37-38)；相似的理由，见 *Sequeira v. Portugal* (dec.)；和 *Eurofinacom v. France* (dec.)。

152. 卧底警察开展和执行行动的方式对评估申请人是否被引诱犯罪有影响。缺乏明确可预见的程序来授权、实施以及监管调查措施将会对确认行为构成引诱犯罪有利（见，例如，*Teixeira de Castro v. Portugal*，法院注意到卧底特工的介入并不是法官监管下的官方反毒品走私行动的一部分 (§38)；*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卧底特工是基于何种理由或何种个人动机在上级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接近申请人 (§64)；以及 *Vanyan v. Russia*，法院注意到警察的行动是由之后开展行动的机构通过一个简单的行政决定而授权采取的，并且这一行政决定就计划购买测试的理由与原因所包含的信息很少，同时行动也不受司法审查以及其他独立的监督 (§§46-47)。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当局使用的“测试购买”技术在 *Veselov and Others v. Russia* 案中进行了严

² 术语 entrapment, police incitement 以及 agent provocateurs 在法院的判例法中可以互换使用。

格的审查，法院认为程序是存在缺陷的，它使警察对申请人专断并破坏了针对申请人的刑事程序的公正性。法院还发现国内法院没有就申请人提出的被引诱犯罪的诉求给予充分的审查，特别是没有审查测试购买的原因和警察及其线人对申请人采取的行动 (§127)。

3. 引诱犯罪辩护的司法审查

153. 涉及到引诱犯罪的情形时，只有当申请人能在审判中有效的提出煽动的问题，不论是通过反驳还是其他方式，才符合了公约第六条的规定。只有诸如两造平等或者辩护权这些一般保障，并不能被认为是充分的保障 (*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69)。在这类案件中，法院表明当辩护人的主张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时，需由控诉方来证明不存在煽动。

154. 如果有关引诱犯罪的诉求已被提出，同时存在引诱犯罪的初步证据，那么司法当局必须审查案件事实，采取必要方式发现真相，进而判定是否存在煽动。一旦发现存在，那就必须根据公约作出相应的结论 (同上, §70)。申请人对刑事指控认罪的事实并不免除审判法院对引诱犯罪的指控进行审查的义务 (同上, §72)。

155. 在这一点上，法院要查证引诱犯罪的控诉能构成国内法下的实质辩护，还是仅为排除证据提供理由或达到相似的结果 (*Bannikova v. Russia*, §54)。尽管在面对有关煽动的诉求时需有国内机构决定什么程序是合适的，但是法院要求就煽动问题的审查程序应具有对抗性、综合性和决定性 (同上, §57)。此外，在调查机构不能披露信息的情况下，法院会特别注意是否符合对抗制程序和两造平等原则 (同上, §58)。

156. 当被告声称他是在被煽动的情况下才犯罪时，刑事法院必须仔细审查存档的材料，因为要使审判符合公约第六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公正，经警察煽动后获得的所有证据必须排除。当警察在没有充分的法律机制和法律保障时开展行动，情况则尤其如此 (*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60)。

157. 如果获得的信息不能使法院得出申请人被引诱犯罪的结论，那么对引诱犯罪诉求的司法审查将成为决定性的 (*Edwards and Lew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46; *Ali v. Romania*, §101; 也可见, *Khudobin v. Russia*, 国内法院没有进行相关事实和法律要素的分析使得引诱行为没有从合法的调查活动中区分出来; *V. v. Finland*, 申请人提出引诱犯罪的辩护意见是不可能的; 以及 *Shannon v. the United Kingdom*, 国内法院将一个人提出的托词作为仔细审查的主要内容，进而发现有关引诱犯罪的控诉是无事实根据的。

(F) 对公正诉讼保障的放弃

158. 公约第六条的文字表达和蕴含的精神都不阻止一个人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通过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放弃公正诉讼的保障。然而，这类放弃，如果根据条约的目的是有效的话，必须通过明确的方式进行，且仍须保有与该权利重要性相符的最小保障。此外，也不能与其他重要的公共利益相冲突 (见 *Hermi v. Italy* [GC], §73; *Sejdovic v. Italy* [GC], §86)。

159. 在认为被告的行为暗示其放弃公约第六条下重要的权利之前，必须显示他能合理预见其行为的后果 (*Hermi v. Italy* [GC], §74; *Sejdovic v. Italy* [GC], §87)。

(2) 公开审讯

第6条第一款

“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理由.....受到.....法院的.....公开的审讯。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及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或者是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的利益的话，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

(A) 公开的原则

160. 程序公开的特点保护诉讼当事人避免司法秘密进行而不受公众监督；它也是使法院保有公信力的方式之一。司法透明化实现了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正诉讼的目的，而公正诉讼又是任何民主社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原则之一（[Sutter v. Switzerland](#), §26; [Riepan v. Austria](#), §27; [Krestovskiy v. Russia](#), §24）。

161. 法庭程序的公开原则包含了两个方面：举行公开审讯以及公开宣判（[Tierce and Others v. San Marino](#), §93; [Sutter v. Switzerland](#), §27）。

(B) 口头审讯和出庭庭审的权利

162. 第六条第一款下的“公开审讯”的权利包含着“口头审讯”的权利（[Döry v. Sweden](#), §37）。

163. 口头公开审讯的原则在刑事案件中尤其重要，一个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必须在初审时就有机会进行审讯（[Tierce and Others v. San Marino](#), §94; [Jussila v. Finland](#) [GC], §40）。

164. 如果不能出庭，那么当事人就很难行使第六条第三款(c), (d), (e)项下列出的具体权利，也就是，“替自己辩护”的权利，“询问证人”的权利以及“如果他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免费为其提供翻译的权利”。因此，保障刑事案件被告出席法庭的权利是第六条的本质要求之一（[Hermi v. Italy](#) [GC], §§58-59; [Sejdovic v. Italy](#) [GC], §§81-84）。

165. 尽管在被告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开展诉讼程序本身并不与公约第六条的规定相冲突，但仍然违背了司法的公正性，因为缺席审判的被告在这之后无法从法院那里获得当场判决，即针对其指控的罪行的法律和事实方面的判决，同时也因为无法确定被告是放弃出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还是意图逃避审判（[Sejdovic v. Italy](#) [GC], §82）。

166. 然而，在案件中开展审讯的义务并不一定落入第六条刑事事项下。鉴于“刑事指控”有不属于传统意义刑法分类案件中的扩大概念（诸如行政处罚、海关法和税收滞纳金），尽管根据刑法的核心本质公正审讯的要求极端严苛，第六条刑事事项的保障并不一定严格适用于该项下的没有任何严重程度的其他案件类型（[Jussila v. Finland](#) [GC], §§41-43）。

167. 没有进行口头审讯正当化是否正当本质上要根据法院所处理的问题的本质来确定——尤其要看这些问题是否存在仅通过档案不能得以充分解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当不存在需要通过口头陈述证据或者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解决的可信度问题和有争议的事实，并且给予被告充分地笔述其案件和质疑对他不利证据的机会，那么口头审讯就不是必须的（[Jussila v. Finland](#) [GC], §§41-42, 47-48）。在这一点上，国家当局考虑经济效

率的需要做出的决定是合法的 ([Jussila v. Finland](#) [GC], §§41-43, 47-48, 有关税收滞纳金程序; 和[Suhadolc v. Slovenia](#) (dec.), 有关道路交通案件的简易程序)。

(C) 上诉程序

168. 被告本人出席上诉审讯的重要性不如出席初审。第六条规定的方式是否适用于上诉程序取决于所涉程序的具体特征, 同时还要考虑国内法律体系下的整个程序以及上诉法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Hermi v. Italy](#) [GC], §60)。

169. 尽管上诉法院或者最高法院没有给予上诉人当庭陈述的机会, 但是上诉许可程序以及包含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的程序仍可能符合第六条的规定 ([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58, 关于许可上诉的问题, 以及[Sutter v. Switzerland](#), §30, 有关上诉法院)。

170. 即使上诉法院就事实和法律问题都有权审查, 第六条也不一定要求公开审讯和亲自出庭 ([Fejde v. Sweden](#), §31)。要决定是否要公开审讯, 必须考虑程序的具体特征, 上诉法院中申请人利益的实际表现方式和保护方式, 尤其要考虑到由法院所决定的问题的性质 ([Seliwiak v. Poland](#), §54; [Sibgatullin v. Russia](#), §36)。

171. 然而, 如果上诉法院需要审查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且要对罪行有无进行全面的评估, 那么对于被告个人向其提供的证明其没有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的证据, 法院在没有进行直接评估的情况下不能做出判决 ([Popovici v. Moldova](#), §68; [Lacadena Calero v. Spain](#), §38)。审讯公开的原则包括被告有权在上诉法庭亲自提供证据。从这一方面来说, 公开的原则追求保护被告辩护权的目的 ([Tierce and Others v. San Marino](#), §95)。

(D) 公开原则的例外

172. 进行公开审判的要求存在例外情形。这一点从第六条第一款的文本就可看出, 第六条第一款包含的规定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 或者是法院认为, 在特殊情况下, 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利益的话, 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严格要求诉讼过程全部或者部分不公开 ([Welke and Bialek v. Poland](#), §74; [Martinie v. France](#) [GC], §40)。

173. 如果存在正当理由适用一个或多个例外情形, 那么当局就没有义务而有权利来要求审讯不公开进行, 只要他们认为这样的限制是必要的 ([Toeva v. Bulgaria](#) (dec.))。

174. 尽管刑事程序对公开性的要求很高, 但有时, 例如为了保护证人的安全和隐私或者为了保证信息和观点的自由交换以保障司法公正, 根据第六条的规定, 程序的公开性可能就需要受到限制 ([B. and P. v. the United Kingdom](#), §37)。

175. 安全问题是许多刑事程序的一个共同特征, 但仅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准公众参与旁听审判的案件却很少 ([Riepan v. Austria](#), §34)。安全措施必须严格限制且要符合必要性原则。司法机构应考虑保障法庭安全的所有可能方案; 在不严格的措施和更加严格的措施都能实现同一目的时, 司法机构应优先考虑不严格的措施 ([Krestovskiy v. Russia](#), §29)。

176. 出于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的考虑, 不准公众参与旁听对囚犯的监狱纪律诉讼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177. 在监狱中进行审判的普通刑事程序并不必然意味着它是不公开的。然而，为了克服在法庭以外的地方进行审判的障碍，国家有义务采取补充性措施来确保公众和媒体知晓审讯的地点并保障他们能参与旁听（[Riepan v. Austria](#), §§28-29）。

178. 案件存在机密信息的情形，在没有权衡国家安全和公开审理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该案件需要进行不公开审判。在将公众排除出刑事程序之前，法院必须提供不公开审理对保护国家利益是必要的理由，且不公开的部分严格限制在为保护该利益所必要的范围内（[Belashev v. Russia](#), §83; [Welke and Bialek v. Poland](#), §77）。

(E) 判决的公开宣判

179. 法院认为不需要对“公开地宣判”进行文义的解释（[Sutter v. Switzerland](#), §33;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91）。

180. 尽管这一措辞似乎表明在公开的法庭宣读判决是必要的，但通过其他方公开判决可能也是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的。作为一般原则，鉴于相关程序的特性以及参考该情形下公约第六条第一款所追求的目标，即确保公众监督司法以保障公正审判权的实现，必须对被告国国内法所规定的公开“判决”的形式进行评估在进行评估时，必须对整个诉讼程序进行考量（[Welke and Bialek v. Poland](#), §83, 在不公开诉讼程序中仅公开宣判判决中的执行部分不违反第六条）。

181. 整个司法判决对公众完全不公开是不合理的。合法的安全顾虑在采取某些措施后被认为是合理的，这些措施包括诸如将判决中包含的一旦披露将危害国家安全和他人安全的部分与其他部分区分开来（[Raza v. Bulgaria](#), §53; [Fazliyski v. Bulgaria](#), §§67-68）。

(3) 合理的时间

第6条第一款

“.....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审讯.....”

(A) 对程序持续时间的决定

182. 在刑事案件中，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任何人有权在合理时间内受到审讯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被告不会长期处于被指控之下，确保指控能被判定（[Wemhoff v. Germany](#), §18; [Kart v. Turkey](#) [GC], §68）。

1. 所考虑的期间的起始点

183. 所考虑的期间始于当事人被指控的那一天（[Neumeister v. Austria](#), §18）。

184. “合理的时间”可能在审判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Deweert v. Belgium](#), §42），例如开始于被拘捕之时（[Wemhoff v. Germany](#), §19），当事人被指控之时（[Neumeister v. Austria](#), §18）或者进行初步调查之时（[Ringeisen v. Austria](#), §110）。

185. “指控”，根据第六条第一款的目的，可以被定义为“主管当局发给一个人的指控他已经犯下刑事罪名的官方通告”（[Deweert v. Belgium](#), §46），这个定义也与有关嫌疑犯的状况是否在“本质上已经被影响”的测试相符合（[Deweert v. Belgium](#), §46; [Neumeister v. Austria](#), §13; [Eckle v. Germany](#), §73; [McFarlane v. Ireland](#) [GC], §143）。

2. 期间的结束

186. 法院认为在刑事案件中，第六条可以适用的期间覆盖所涉及的整个程序（[König v. Germany](#), §98), 包括上诉程序（[Delcourt v. Belgium](#), §§25-26; [König v. Germany](#), §98; [V.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109）。此外，第六条第一款表明法院做出判决之时可以作为最后的时间截点，当法院对指控的犯罪进行宣判时，也可能是一个上诉法院的判决（[Neumeister v. Austria](#), §19）。

187. 即使判决已被上诉，所要考虑的期间也至少要延续至无罪宣判或定罪之时。没有进一步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对抗司法程序迟延的保护措施将在首次审讯之时终结：审判庭的无理由延期或者过分延迟也是令人担忧的（[Wemhoff v. Germany](#), §18）。

188. 就定罪来说，如果刑期是不确定的，那么第六条第一款的内容就不包括“决定……任何刑事罪名”（[Eckle v. Germany](#), §77; [Ringelsen v. Austria](#), §110; [V.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109）。

189. 对任何法院所做的**判决的执行**须被认为是第六条意义下的审判的内在组成部分（[Assanidze v. Georgia \[GC\]](#), §181）。如果成员国国内的法律或行政系统使一个最终有约束力的无罪司法判决对消除无罪人的不利影响不起作用时，那么公约第六条所规定的保障措施便是空洞的。刑事程序作为一个整体形式以及第六条所提供的保护都不会在无罪判决作出后就结束（同上，§182）。如果国家行政机构对被告的无罪判决拒绝履行，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那么被告在司法程序阶段享有的第六条所提供的保障则有部分是虚假的（同上，§183）。

(B) 合理期限的评估

1. 原则

190. 诉讼期限的合理性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整体评估（[Boddaert v. Belgium](#), §36）。尽管某个诉讼阶段的进行速度是合理的，整个诉讼期间长度仍然可能超过“合理期限”（[Dobbertin v. France](#), §44）。

191. 第六条要求司法程序要迅速展开，但也提出合适的司法行政的一般原则。因此对于这个基本要求的不同方面就需要进行权衡（[Boddaert v. Belgium](#), §39）。

2. 标准

192. 在决定刑事诉讼的持续期间是否合理时，法院需考虑诸多因素，例如案件的复杂性，申请人的行为以及相关行政和司法机构的行为（[König v. Germany](#), §99; [Neumeister v. Austria](#), §21; [Ringelsen v. Austria](#), §110; 和可见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67; 和 [Pedersen and Baadsgaard v. Denmark](#), §45）。

193. **案件的复杂性**可能来自于，例如，被指控的罪行的数量，程序所涉及的人（例如被告或证人）的数量，或者案件的国际性（[Neumeister v. Austria](#), §20: 在本案中，所涉及的交易的波及面包括众多国家，这就需要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以及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实施。同时涉及的人员有22人，且有部分人员在海外）。一个案件可能变得非常复杂当嫌疑犯涉及白领犯罪，即涉及多个公司的大范围诈骗行为以及为了逃避调

查部门调查而进行了复杂交易，这种情形下需要大量的审计和金融专家（[C.P. and Others v. France](#), §30）。

194. 但即使案件可能被认为存在某些复杂性，法院也不能将没有任何解释的长期不作为视为“合理的”（[Adiletta v. Italy](#), §17:在本案中，总共的期间包含十三年五个月，其中从案件被提交到调查法官到询问被告和证人有五年迟延，案件退回调查法官到重新对申请人进行审理有一年九个月迟延）。

195. **申请人的行为。**第六条不要求申请人积极配合司法机构。申请人也不会因为用尽国内法下所有的救济措施而受指责。然而，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既定的客观事实，这一事实不能归咎于被告国，且在决定程序期间是否超过合理期限时需要加以考虑（[Eckle v. Germany](#), §82: 在本案中，申请人的行为存在故意迟延程序的情形，例如系统性的反对法官；部分行为甚至有故意妨碍司法的嫌疑）。

196. 例如，必须考虑到申请人企图拖延调查的情形，这可以从案件卷宗中明显看出来。（[I.A. v. France](#), §121:在本案中，申请人等到被告知案件即将移交给公诉人后，才要求进行其他调查措施）。

197. 申请人不能将逃亡期间也就是试图逃避国内司法审判的期间作为超过合理诉讼期限的控诉理由。当被告人逃离一个法治国家时，那么他在逃离之后就很可能被认为丧失了控告程序期限不合理的权利，除非他能提供充足的理由来驳斥这一假定（[Vayic v. Turkey](#), §44）。

198. **相关机构的行为。**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有应当按照法院能够满足条约各项要求的方式来组建国内司法体系（[Abdoella v. the Netherlands](#), §24; [Dobbretin v. France](#), §44）。

199. 临时的案件积压并不会涉及缔约国方面的责任。只要缔约国能够及时处理这类特殊情形（[Milasi v. Italy](#), §18; [Baggetta v. Italy](#), §23）。当局提到的繁重的工作量以及采取的各种补救措施几乎不会受到法院的决定性重视（[Eckle v. Germany](#), §92）。

200. 在评估程序期间的合理性时还要考虑与申请人利益攸关的事务。例如，被告被审前羁押，这一情形在法院评估指控是否在合理时间内进行判决时将被考虑（[Abdoella v. the Netherlands](#), §24: 在本案中，将文件两次提交到最高法院所需的时间超过22个月，而处理这个案件的总时间只有52个月。法院认为这类不作为的持续期间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被告还处于被羁押的情况下）。

(C) 几个例子

1. 超过合理时间

—九年七个月的时间，除了涉及人员（35）之外案件没有任何特别的复杂性，尽管法院要处理暴乱之后所带来的额外工作量（[Milasi v. Italy](#), §§14-20）。

—十三年四个月的时间，该地区的政治问题加上法院巨大的工作量，而国家直到几年后才开始改善法院工作条件（[Baggetta v. Italy](#), §§20-25）。

—五年五个月十八天，主审法官完成判决书再到交付判决花了三十三个月，并且没有采取任何适当的纪律措施（[B. V. Austria](#), §§48-55）。

—五年十一个月，在重大侵占案件中，就被询问的人的数量以及需审查的文件的技术含量来说案件非常复杂，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持续五年两个月的调查是合理的；此外，几个不作为的期间都是由当局引起的。因此，尽管审判期的持续时间看起来是合理的，但调查不能被认为是尽职的（[Rouille v. France](#), §29）。

一十二年七个月十天，案件并不复杂且申请人没有使用任何方式来迟延程序，但从向行政法院提起申请到收到税务机关开始起诉的通知花了两年九个多月的时间（[Clinique Mozart SARL v. France](#), §§34-36）。

2. 没有超过合理期间

一五年两个月，诈骗和欺诈性破产相结合的复杂案件，申请人提出众多诉求和上诉，不仅涉及他的释放，还对涉案法官提出质疑以及试图使案件移送到其他法院管辖（[Ringisen v. Austria](#), §110）。

一七年四个月：自提出起诉起七年多过去，但对被告有罪或无罪的判决仍然未有定论，在众多案件中这类情形自然意味着时间太长而应被认为是超出合理范围；此外，有十五个月，法官没有询问众多共同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询问证人和履行其他职责；然而，这个案件被认为特别复杂（指控的数量和所涉人员的数量，国际性使得案件存在特殊的困难，因为执行请求需要国外司法协助等等）（[Neumeister v. Austria](#), §21）。

III. 特殊的保护

A. 无罪推定

第6条第二款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在未经依法证明为有罪之前，应当推定为无罪。”

(1) 证明责任

201. 无罪推定原则特别要求，法庭成员在履行义务时不应预先认定被告犯了所控之罪；证明责任在控诉方且罪行存疑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控诉方需告知被告被控诉的案件进而使被告能据此准备和提交答辩；此外，控诉方还需举出充足证据来指证被告（[Barberà, Messegué and Jabardo v. Spain](#), §77; [Janosevic v. Sweden](#), §97）。如果证明责任从控诉方转移到辩护方，那么这将违背无罪推定原则（[Telfner v. Austria](#), §15）。在做出终止诉讼的决定后，之后民事赔偿程序的证明责任仍不能改变（[Capeau v. Belgium](#), §25）。

202. 刑事责任的免除并不妨碍基于相同事实，通过不太严格的举证责任来确立赔偿的民事责任（[Ringvold v. Norway](#), §38; [Y v. Norway](#), §41; [Lundkvist v. Sweden](#) (dec.))。

(2) 法律与事实的推定

203. 在刑事案件中，一个人享有的无罪推定以及由控诉方证明对其的指控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任何一个刑法系统都会存在对事实或法律的推定且原则上不为公约所禁止（[Falk v. the Netherlands](#) (dec.)，有关对汽车的登记人处罚金，而该人在交通事故之时并不是实际驾驶人）。特别是，缔约国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认为一些简单的或客观的事实是有罪的，而不考虑这一事实是由故意还是由过失造成的（[Salabiaku v. France](#), §27，有关持有毒品的走私行为被推定为存在刑事责任；[Janosevic v. Sweden](#), §100，基于客观理由要求加收滞纳金，且在法院作出决定之前就执行）。然而，第六条第二款要

求国家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推定，国家要考虑利害得失和辩护人的权利（[Salabiaku v. France](#), §28; [Radio France and Others v. France](#), §24, 有关广播节目中的诽谤言论而推定出版主任有刑事责任；[Klouvi v. France](#), §41, 由于法律事先推定对被告的指控因缺乏证据而宣告无罪是错误的，这使得对恶意指控进行辩护成为不可能）。

204. 根据刑法进行推定时，缔约国需要在利害得失和辩护人权利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换句话说，就是使用的方式需与要实现的合法目的成比例（[Janosevic v. Sweden](#), §101; [Falk v. the Netherlands](#) (dec.)）。

(3) 第六条第二款的范围

(A) 刑事程序

205. 第六条第二款，不论诉讼结果，适用于整个刑事程序，而不仅在审查指控实质时适用（见，在众多案件中，[Poncelet v. Belgium](#), §50; [Minelli v. Switzerland](#), §30; [Garycki v. Poland](#), §68）。

206. 仅因为上诉程序是在一审判决被告有罪后才进行的，也不能排除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Konstas v. Greece](#), §36）。

207. 一旦被告被证实有罪，在量刑程序中，针对被告个人品格和行为的指控，第六条第二款不能适用，除非这类指控在性质和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公约自治意义下的新的“罪名”（[Phillips v. the United Kingdom](#), §35; [Böhmer v. Germany](#), §55; [Geerings v. the Netherlands](#), §43）。

208. 但是，一个人享有的无罪推定以及由控诉方证明对其的指控的权利是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下公正诉讼的一般概念的一部分，因而适用于量刑程序（[Phillips v. the United Kingdom](#), §§39-40; [Grayson and Bar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36 和39）。

(B) 后续法律程序

209. 当一个人被宣告无罪或者有关他的刑事程序仍在继续时，无罪推定原则使其免于受到公职人员和当局的对待，即使其事实上的确触犯了被指控的罪行。如果不尊重其他程序中的无罪宣告和中止决定，那么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保障就只是理论上的和不切实际的。同样重要的是刑事程序终结后人的名誉以及公众对其看法（[Allen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94）。

210. 在随后的程序中出现第六条第二款的适用问题时，申请人须表明完结的刑事程序与随后的程序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可能存在的，例如，随后的程序要求审查之前刑事程序的结果，特别是随后的程序要求法院有义务分析刑事判决；要求审查或评估已经归档的证据；评估申请人在导致刑事指控部分或者全部事件中的参与程度；或者评估申请人可能犯罪的迹象（[Allen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104）。

211. 法院在考虑第六条第二款是否适用于司法判决时考虑如下相关刑事程序决定，其中包括：

- (a) 被告之前承担法院费用和诉讼费用的义务；
- (b) 被告之前对羁押或者刑事程序造成的其他不便提出的赔偿要求；
- (c) 被告之前要求的辩护费；
- (d) 被告之前被非法或错误调查和起诉后就所遭受的损失提出的赔偿要求；
- (e) 存在向受害人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 (f) 申请人针对承保人提出的民事诉讼请求被拒绝;
- (g) 在控诉方决定不再对双亲虐待儿童提出控诉时, 继续执行儿童监护措施;
- (h) 违纪或开除的问题; 以及
- (i) 撤回申请人享有公益住房的权利 (见 [Allen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98 引用众多其他案例)。

(4) 有偏见的陈述

212. 第六条第二款旨在防止公正的刑事审判被与这些程序关联密切的偏见陈述破坏。如果这类程序不存在, 那么在考虑被告名誉是否受到保护以及民事权利是否能交由法庭决定时, 就需要考虑利于确定犯罪的陈述或其他不合理的行为, 因为此时可能会产生公约第八条和第六条的问题 ([Zollmann v. the United Kingdom, Ismoilov and Others v. Russia](#), §160)。

213. 表明某人仅存在犯罪嫌疑的陈述与某人已犯所涉罪行的明确声明之间需进行本质的区分 ([Ismoilov and Others v. Russia](#), §166; [Nešťa v. Slovakia](#), §89)。后者侵犯了无罪推定原则, 而前者在法院审查的各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Garycki v. Poland](#), §67)。

214. 由法官或者其他公共机构做的陈述是否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须根据这一不利陈述做出的具体情形来决定 ([Daktaras v. Lithuania](#), §42; [A.L. v. Germany](#), §31)。

215. 法官作出的陈述与调查机构作出的陈述相比, 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Pandy v. Belgium](#), §43)。

216. 只要刑事程序的结果不会导致对指控的实体部分作出决定, 对被告无罪表示怀疑的表达是被允许的 ([Sekanina v. Austria](#), §30)。然而, 一旦最终被宣告无罪, 任何有罪怀疑声明都不符合无罪推定的规定 ([Rushiti v. Austria](#), §31; [O. v. Norway](#), §39; [Geerings v. the Netherlands](#), §49; [Paraponiaris v. Greece](#), §32)。

(5) 司法机构的陈述

217. 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人做出司法判决, 在依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 即认定其有罪的将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即使不存在相关证明, 这种违反都是确定的, 只要有理由表明法院认为被告是有罪的。(见, 权威案件, [Minelli v. Switzerland](#), §37; 以及, 更近期的案件, [Nerattini v. Greece](#), §23; [Didu v. Romania](#), §41)。审判庭在审理早期就表达这类观点将违反这一推定 ([Nešťa v. Slovakia](#), §88; [Garycki v. Poland](#), §66)。

218. 如何适用第六条第二款规定, 重点是看所涉及的陈述的本质含义, 而不是字面含义 ([Lavents v. Latvia](#), §126)。

219. 即使申请人最终被判有罪, 推定其无罪的初始权利在依法证明有罪之前不能被撤销 (见 [Matijašević v. Serbia](#), §49; [Nešťa v. Slovakia](#), §90, 有关延长申请人羁押期限的决定)。

(6) 公职官员的陈述

220. 法官或法院可能会违反无罪推定, 其他公共机构也有这个可能 ([Allenet de Ribemont v. France](#), §36; [Daktaras v. Lithuania](#), §42; [Petyo Petkov v. Bulgaria](#), §91)。第六条第二款禁止公职人员就仍未结束的刑事调查做出让公众认为嫌疑人有罪的言论, 禁止

其在有权司法机构进行事实评估之前进行预先评价（[Ismoilov and Others v. Russia](#), §161; [Butkevicius v. Lithuania](#), §53）。

221. 无罪推定的原则允许当局告知公众刑事调查的进程，但要求他们在尊重无罪推定原则的条件下保持足够的谨慎小心（[Fatullayev v. Azerbaijan](#), §159; [Allenet de Ribemont v. France](#), §38; [Garycki v. Poland](#), §69）。

222. 法院强调公职人员在被告被审判并定为有罪之前谨慎发表言论非常重要（[Daktaras v. Lithuania](#), §41; [Arriqo and Vella v. Malta](#) (dec.); [Khuzhin and Others v. Russia](#), §94）。

(7) 媒体负面的行为

223. 在民主社会下，媒体就有关公共利益案件做出的严厉的评论是无可避免的（[Viorel Burzo v. Romania](#), §160; [Akay v. Turkey](#) (dec.)）。

224. 然而，媒体恶意的行为可能通过影响公众的观念而影响审判的公正，并可能导致所召集的陪审员判定被告有罪（[Kuzmin v. Russia](#), §62）。尽管嫌疑人对审判法院不应存在偏见的主观理解无可厚非，但却不是决定性的；重要的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形判定他的担忧是否是客观合理的（[Wloch v. Poland](#) (dec.), [Daktaras v. Lithuania](#) (dec.), [Priebke v. Italy](#) (dec.); 和 [Mustafa Kamal Mustafa \(Abu Hamza\) \(no. 1\)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37-40, 有关新闻就审判法院公正性的报道的影响）。

225. 不同于陪审团的成员组成的法庭，由专业法官所组成的国内法庭一般来说拥有适当的经验和培训，从而使他们能免受任何外界影响（[Craxi v. Italy](#) (no.1), §104; [Mircea v. Romania](#), §75）。

226. 出版嫌疑人的照片本身并不违反无罪推定的规定（[Y.B and Others v. Turkey](#), §47）。在电视上播放嫌疑人的形象可能在某些情形下涉及第六条第二款的问题（[Rupa v. Romania](#) (no. 1), §232）。

(8) 未提供信息的制裁

227. 无罪推定与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密切相关（[Heaney and McGuinness v. Ireland](#), §40）。

228. 涉嫌交通肇事罪时要车主指认驾驶员不符合公约第六条的规定（[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229. 要求驾驶员进行呼吸测醉和血液测试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Tirado Ortiz and Lozano Martin v. Spain](#) (dec.)）。

B. 第六条第三款：辩护权

第6条第三款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 (a) 以他所了解的语言立即详细地通知他被指控的罪名的性质以及被指控的原因；
- (b) 应当有适当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为辩护作准备；
- (c) 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协助费用的，则基于公平利益考虑，应当免除他的有关费用；
- (d) 询问不利于他的证人，并在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具有相同的条件下，让有利于他的证人出庭接受询问；

(e) 如果他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可以请求免费的译员协助翻译。”

230. 第六条第三款所规定的有关辩护权的要求可以被认为是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保障的公正诉讼权的一个特殊方面 ([Saknovskiy v. Russia](#) [GC], §94; [Gäfgen v. Germany](#) [GC], §169)。

231. 第六条第三款的特殊保障列出了公正诉讼概念下刑事案件中会出现的典型程序情形，但这些保障的本质目的一直都是（促进）保障整个刑事程序的公正性。因此，第六条第三款所提供的保障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必须根据它在整个程序中所起的作用对其解释 ([Mayzit v. Russia](#), §77; [Can v. Austria](#), §48)。

(1) 第六条第三款(a)项

第6条第三款a项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a) 以他所了解的语言立即详细地通知他被指控的罪名的性质以及被指控的原因；”

(A) 综述

232. 必须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一款所保障的公正诉讼的一般权利来评估第六条第三款a项的范围。在刑事案件中，有关对被告指控的详细信息的规定，以及法院随后针对此案件可能做出的法律定性是保障程序公正的一个必要前提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52; [Sejdovic v. Italy](#) [GC], §90)。

233. 必须根据被告有为其辩护做准备的权利来考虑第六条第三款的(a)项和(b)项所涉及的被告应被通知被指控罪名的性质以及原因的权利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54; [Dallos v. Hungary](#), §47)。

(B) 有关指控的信息

234. 第六条第三款(a)项指出需要特别注意告知被告“被控罪名”。在刑事程序中，对罪名的详细说明非常重要，因为正是从他们提供服务的这一刻开始嫌犯被正式书面通知被控罪行的事实和法律基础 ([Kamastinski v. Austria](#), §79;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51)。

235. 第六条第三款(a)项赋予被告不仅享有被通知被控“原因”的权利，也就是他被控实施以及指控罪名所基于的行为，还享有被通知被控罪名的“性质”的权利，即对行为的法律定性 ([Mattoccia v. Italy](#), §59; [Penev v. Bulgaria](#), §§33和42, 2010年1月7日)。

236. 不需要提供指控所基于的证据材料的信息 ([X. v. Belgium](#) (dec); [Collozza and Rubinat v. Italy](#))。

237. 第六条第三款对于通知被告被指控的罪名的性质以及被指控的原因的方式没有特殊的形式要求([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53; [Drassich v. Italy](#), §34; [Giosakis v. Greece](#) (no. 3), §29)。

238. 通知被告的义务完全在控诉方身上，且不能通过消极提供信息而未引起被告注意的方式履行该义务([Mattoccia v. Italy](#), §65; [Chichlian and Ekindjian v. France](#), §71)。

239. 被告必须确实了解到信息，仅有收据是不够的([C. v. Italy](#) (dec.))。

240. 如果控诉的情形是由于被告自己的行为而造成的，那么后者没有资格声称违反辩护权 ([Erdogan v. Turkey](#) (dec);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6)。

241. 如果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员，那么当局就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详细通知被告他被指控的罪名的性质以及被指控的原因([Vaudelle v. France](#), § 65)。

(C) 改变指控

242. 被告须充分完全地被告知所指控的任何罪名，包括被指控的“原因”的改变；且被告须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来对此做出回应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或控诉组织其辩护 ([Mattoccia v. Italy](#), § 61; [Bäckström and Andersson v. Sweden](#) (dec.))。

243. 有关被指控的信息，包括法院对该事件的可能法律定性，必须在庭审前提交起诉状时给出，或者至少是在庭审中通过明示或暗示指控范围等其他方式给出。仅抽象地提出法院有可能得出与控诉方所提的罪名性质不同的结论显然是不够的([I.H. and Others v. Austria](#), § 34)。

244. 如果在诉讼过程中改变事实认定，那么被告必须有可能通过实际有效的方式及时行使其辩护权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 62; [Block v. Hungary](#), § 24)。

245. 如果涉及的是指控要素，那么被告必须能够充分预见指控的改变 ([De Salvador Torres v. Spain](#), § 33; [Sadak and Others v. Turkey](#) (no. 1), §§ 52 and 56; [Juha Nuutinen v. Finland](#), § 32)。

246. 如果被告有机会就重新做出的指控在上一级法院进行辩护并就所有相关法律和事实方面的指控提出异议，则可以在上诉程序中弥补通知指控时的瑕疵 ([Dallos v. Hungary](#), §§ 49-52; [Sipavičius v. Lithuania](#), §§ 30-33; [Zhupnik v. Ukraine](#), §§ 39-43; [I.H. and Others v. Austria](#), §§ 36-38; [Juha Nuutinen v. Finland](#), § 33)。

(D) 详细

247. 尽管“详细的”信息的范围因每个案件的特殊情形而有所不同，但被告至少要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使他完全了解被指控的范围，进而能充分地准备辩护。

248. 在这一点上，信息是否充分必须根据第六条第三款和第一款来进行评估，即每个人是否享有充足的时间以及条件来准备辩护，是否具有公正审讯的一般权利 ([Mattoccia v. Italy](#), § 60; [Bäckström and Andersson v. Sweden](#) (dec.))。

(E) 立即

249. 信息必须及时告知被告以便让其为辩护做准备，这是第六条第三款 (a) 项规定的主要目的 ([C. v. Italy](#) (dec.))，在审判前四个月告知申请人所指控的罪名被认为是合理的；反之，见 [Borisova v. Bulgaria](#), §§ 43-45，申请人只有几个小时来准备辩护，且没有律师帮助辩护)。

250. 在审查是否符合第六条第三款 (a) 时，法院考虑“指控”和“刑事罪名”的自治意义时，应根据目标而非场合对这两个词进行解释 ([Padin Gestoso v. Spain](#) (dec.); [Casse v. Luxembourg](#), § 71)。

(F) 语言

251. 如果显示出或有理由认为被告对信息所使用的语言不太了解，当局必须为其提供翻译 ([Brozicek v. Italy](#), § 41; [Tabai v. France](#) (dec.))。

252. 尽管第六条第三款（a）项并未规定将相关信息以书面形式或者翻译成书面形式提供给外国被告，但如果起诉状没有翻译成被告了解的语言，那么被告不懂法院使用的语言可能使他处于实际不利的地位 (*Kamasinski v. Austria*, § 79; *Hermi v. Italy* [GC], § 68)。

253. 然而，充分的有关指控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口头翻译起诉状的方式提供给被告，只要这能让被告准备其辩护 (*Kamasinski v. Austria*, § 81; *Husain v. Italy* (dec.))。

254. 这一条款并不规定被告享有将法院所有文件进行翻译的权利 (*X. v. Austria* (dec), p. 70)。

255. 根据第六条第三款（e）项所规定的获得免费译员协助翻译的权利，对指控进行翻译的费用须由国家承担 (*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 45)。

2. 第六条第三款（b）项

第六条第三款（b）项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b）应当有适当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为辩护作准备；”

(A) 一般考量

256. 公约第六条第三款（b）项考虑了合理辩护的两个要素，即条件和时间问题。这一条款意味着被告的实质性辩护活动可能包括准备庭审所必须的一切。被告须可以适当的方式组织其辩护，不受限制的在庭前呈现所有相关辩词，进而有机会影响诉讼结果 (*Can v. Austria*, § 53; *Gregačević v. Croatia*, § 51)。

257. 给被告提供适当的时间和便利条件的问题，必须根据每个案件的特殊情形而进行评估 (*Iglin v. Ukraine*, § 65; *Galstyan v. Armenia*, § 84)。

(B) 适当的时间

258. 第六条第三款（b）项的规定防止了被告被草率的审判 (*Kröcher and Möller v. Switzerland* (dec); *Bonzi v. Switzerland* (dec))。尽管诉讼程序保持一定的速度非常重要，但这不能以牺牲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代价 (*OAO Neftyanaya Kompaniya Yukos v. Russia*, § 540)。

259. 在评估被告是否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其辩护时，必须考虑诉讼的性质以及案件的复杂程度和诉讼的阶段 (*Gregačević v. Croatia*, § 51)。同时也必须考虑律师的一般工作量；但是，如果某个案件需要紧急处理时，要求辩护律师的工作重心发生一定的转移也并不是不合理的 (*Mattick v. Germany* (dec.))。

260. 公约第六条第三款（b）项并不要求庭前准备工作在首次开庭前全部完成。审理过程不可能事先完全规划好，可能会出现尚未发现需要双方进一步准备的问题 (*Mattick v. Germany* (dec.))。

261. 当在诉讼过程中出现某些事件时，辩方须有额外的时间来调整其观点，准备诉求，申请上诉等 (*Miminoshvili v. Russia*, § 141)。这类“事件”可能包括起诉状的改变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 62)，控方提出新的证据 (*G.B. v. France*, §§ 60-62)，或者专家意见在审理中突然有很大的改变 (*G.B. v. France*, §§ 69-70)。

262.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出现问题，被告可以要求暂停审理或者延期审理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8; *Bäckström and Andersson v. Sweden* (dec.); *Craxi v. Italy*

(no. 1), § 72), 除非出现例外情形(*Goddi v. Italy*, § 31)或者在国内法律实践中不存在这类权利(*Galstyan v. Armenia*, § 85)。

263. 在某些情形下, 为了给予辩方充足的时间, 法院可能被要求暂停其提出的审讯(*Sadak and Others v. Turkey* (no. 1), § 57; *Sakhnovskiy v. Russia* [GC], §§ 103 and 106)。

264. 为了使被告有效行使上诉权, 国内法院必须充分清晰得说明其判决所基于的理由(*Hadjianastassiou v. Greece*, § 33)。上诉期届满之前仍没有理由充分的判决, 则必须给予被告足够的信息以使他了解情况提起上诉(*Zoon v. the Netherlands*, §§ 40-50; *Baucher v. France*, §§ 46-51)。

265. 国家必须保证受到刑事指控的每一个人享有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的保障。由被定罪的上诉人查明期限何时生效、届满不符合缔约国的勤勉义务, 缔约国应确保第六条规定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Vacher v. France*, § 28)。

(C) 适当的便利条件

(1) 获得证据

266. 任何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应享有的“便利条件”包括有机会了解整个诉讼中所有调查结果以便使其能为辩护做准备 (*Huseyn and Others v. Azerbaijan*, § 175; *AO Neftyanaya Kompaniya Yukos v. Russia*, § 538)。

267. 如果一个人被拘留候审, “便利条件”可能就包括准许被告在拘留时能集中注意进行读和写 (*Mayzit v. Russia*, § 81; *Moiseyev v. Russia*, § 221)。被告及其律师不会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参与诉讼提交诉状是非常重要的(*Makhfi v. France*, § 40; *Barberà, Messegué and Jabardo v. Spain*, § 70)。

268. 应保证被告享有的便利条件仅包括那些能帮助他或可能帮助他准备其辩护的条件 (*Padin Gestoso v. Spain* (dec.)); *Mayzit v. Russia*, § 79)。

269. 并不要求被告能够直接获得案卷, 只要他能通过其代表人了解案卷材料即可 (*Kremzow v. Austria*, § 52)。然而, 被告只能获得有限的法庭文件不能妨碍被告在庭审前获得证据并有机会通过其律师的口头陈词就该证据发表意见(*Öcalan v. Turkey* [GC], § 140)。

270. 当准许被告自行辩护时, 不准其获取案卷材料相当于侵犯了他的辩护权 (*Foucher v. France*, §§ 33-36)。

271. 为了便利被告开展辩护, 不能阻碍被告获取案卷中相关文件的复印件以及收集和使用任何记录 (*Rasmussen v. Poland*, §§ 48-49; *Moiseyev v. Russia*, §§ 213-218; *Matyjek v. Poland*, § 59; *Seleznev v. Russia*, §§ 64-69)。

272. 获得案卷的权利不是绝对的。在一些案件中, 为了保护他人的基本权利, 保护诸如国家安全等重要的公共利益, 保护证人或者保密警察侦察犯罪的方法, 对被告隐瞒某些证据可能是必要的。然而, 只有这些限制辩护权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被第六条第一款所允许。法院将审查决策程序来确保其符合对抗式诉讼和两造平等的要求, 同时确保存在充分的保障措施来保障被告利益(*Natunen v. Finland*, §§ 40-41; *Dowsett v. the United Kingdom*, §§ 42-43; *Mirilashvili v. Russia*, §§ 203-209)。

273. 没有披露可能使被告免罪或者减刑的辩护证据材料可能意味着拒绝提供准备辩护所需的便利条件, 由此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三款 (b) 项所保障的权利。但是, 被告可能需要就其请求提供理由, 而国内法院有权审查这些理由的有效性(*Natunen v. Finland*, § 43; *C.G.P. v. the Netherlands* (dec))。

(2) 咨询律师

274. 提供给被告的“便利条件”包括咨询律师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9; *Goddi v. Italy*, § 31)。被告有机会与其辩护律师交换意见是准备其辩护的基础(*Bonzi v. Switzerland* (dec); *Can v. Austria*, § 52)。

275. 第六条第三款 (b) 项与公约第六条第三款 (c) 项规定的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相重叠 (见, 例如, *Lanz v. Austria*, §§ 50-53; *Öcalan v. Turkey* [GC], § 148; *Trepashkin v. Russia* (no. 2), §§ 159-168)。

3. 公约第六条第三款 (c) 项: 由本人或者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的权利

公约第六条第三款 (c) 项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c) 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 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协助费用的, 则基于公平利益考虑, 应当免除他的有关费用; ”

276. 公约第六条第三款 (c) 项涵盖了第六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公正诉讼权的一个方面 (*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dec.); *Foucher v. France*, § 30)。该条款保证当被告在案件中没有充分的代表人为其辩护时, 针对他的诉讼程序将不会展开 (*Pakelli v. Germany*, § 84)。它包括三项权利: 自己辩护; 由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 以及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免费法律协助 (*Pakelli v. Germany*, § 31)。

(A) 适用范围

277. 被刑事指控的被告在程序的任何阶段都须得到第六条第三款 (c) 项的保护 (*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 37)。因此, 即使案件还未送交审理, 只要诉讼的公正性可能因初始阶段违反第六条的规定而受到严重侵害, 那么就会涉及到上述保护 (*Öcalan v. Turkey* [GC], § 131; *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 36; *Magee v. the United Kingdom*, § 41)。

278. 当在诉讼准备阶段考虑第六条第三款 (b) 项时, 第六条第三款 (c) 项规定了被告的一般性权利: 即在整个程序中获得律师支持与协助权 (*Can v. Austria*, § 54)。

279. 在审前阶段, 例如初步调查阶段, 第六条第三款 (c) 项的适用方式取决于所涉程序的特点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形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 *Berlinski v. Poland*, § 75)。第六条一般要求被告在被警察讯问的初始阶段就能获得律师协助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63; *Öcalan v. Turkey* [GC], § 131; *Salduz v. Turkey* [GC], § 54; *Averi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59;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 *Dayanan v. Turkey*, § 31)。但是, 这项权利可能因正当理由而受到限制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63; *Magee v. the United Kingdom*, § 41)。每个案件涉及的问题是: 根据整个诉讼程序, 这些限制是否剥夺了被告公正审讯的权利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63;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即使剥夺接触律师的权利可能存在使人信服的理由, 这项限制也不能过度侵害第六条所规定的被告的权利 (*Salduz v. Turkey* [GC], § 55)。

280. 同样的, 涉及上诉法院时, 第六条第三款 (c) 项的适用方式也取决于所涉程序的特点 b (*Pakelli v. Germany*, § 29; 同时比照, *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41)。必须考虑国内法律秩序下整个程序以及上诉法院在其中的地位 (*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同时比照, *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41)。需要考虑的是: 例如, 上诉的程序的本质以及其在整个刑事程序中的重要性; 上诉法院权利的范围;

申请人的利益在上诉法院实际被呈现和保护的方式([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B) 自行辩护

281. 作为一个整体，公约第六条的目的表明受刑事指控的人有权参与审讯 ([Zana v. Turkey](#) [GC], § 68; [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8)。而与该权利密切相关的第六条第三款(c)项则提供给被告自行辩护的可能性。因此，通常情况下被告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出庭辩护并不违反第六条规定，除非公平利益有相反要求([Galstyan v. Armenia](#), § 91)。

282. 然而，自行辩护并不是绝对受到保障的。是允许被告自行辩护还是给其提供法律协助属于缔约国自由裁量的范围，因为与法院相比，缔约国能根据其司法制度采取更适当的方式来保护辩护权([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dec.))。因此，国内法院有权考虑公平利益下强制指定律师的规定([Croissant v. Germany](#), § 27; [Lagerblom v. Sweden](#), § 50)。这一方式是根据被告的利益而确定的，它能确保被告为其利益进行辩护([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dec.))。

283. 此外，第六条第三款 (c) 项并未赋予被告无限制的使用任何辩护理由的权利。当被告选择自行辩护，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也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辩护存在尽职尽责的义务([Melin v. France](#), § 25)。那些被指控刑事犯罪的人如果在行使辩护权时故意就刑事程序中的证人和其他涉案人员的可罚行为进行虚假猜测而不被起诉，那么其辩护权就被滥用了([Brandstetter v. Austria](#), § 52)。仅存在被告因辩词所提的主张而在之后遭到起诉的可能性不能被认为违反第六条第三款(c)项下的权利。但当根据国内法律和实践，随后的起诉危害如此之大以至于实质上禁止被告自行行使其辩护权，那么情况就可能会有些不同([Brandstetter v. Austria](#), § 53)。

(C) 法律协助

284. 每个受到刑事罪名指控的人都有权受到律师协助进行辩护是公正诉讼权的一个基本特性 ([Salduz v. Turkey](#) [GC], § 51)。作为一项法则，当嫌疑人被警察拘留或者审前羁押之时，他就能获得法律协助([Dayanan v. Turkey](#), § 31)。被告能够有效参与刑事审讯的权利一般来说不仅包括出席的权利，还包括在必要时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Lagerblom v. Sweden](#), § 49; [Galstyan v. Armenia](#), § 89)。以此类推，仅有申请人律师出席法庭并不能弥补被告的缺席([Zana v. Turkey](#) [GC], § 72)。

285. 法定代表权不取决于被告是否出席 ([Van Geyselghem v. Belgium](#) [GC], § 34;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9; [Poitrimol v. France](#), § 34)。事实上，即使被告在被传唤后没有出席且对此也无任何解释，其受律师协助进行辩护的权利也不能被剥夺([Van Geyselghem v. Belgium](#) [GC], § 34; [Pelladoah v. the Netherlands](#), § 40; [Krombach v. France](#), § 89; [Galstyan v. Armenia](#), § 89)。

286. 任何受刑事罪名指控的人所享有的由其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 ([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45; [Pakelli v. Germany](#), § 31)。尽管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告选择律师的权利应受到尊重，但国内法律可以推翻这一选择，只要有相关的充足的理由表明这样做是公平利益所必须的([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45; [Croissant v. Germany](#), § 29)。例如，考虑到整个程序的特殊性质，只有专业律师才允许进行口头陈辩的规定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47)。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要具有实践性、有效性而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话，则不能仅仅依赖于满

足过度形式主义的条件：法院应确保审判是公正的，相应的，参加审判的律师有机会为缺席的被告进行辩护（[Van Geyselhem v. Belgium](#) [GC], § 33; [Pelladoah V. the Netherlands](#), § 41）

287. 和其他公正诉讼权一样，被告可以放弃其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Pishchalnikov v. Russia](#), § 77）。然而，在被告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暗示放弃这一重要的第六条下的权利之前，必须表明他能合理预见其行为的后果。当被告需要律师时，额外的保障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被告没有律师，那么他了解其权利的机会就小，这就导致他们受到尊重的机会也变小了（[Pishchalnikov v. Russia](#), § 78）。

(D) 法律援助

289. 第六条第三款（c）项所包含的最后的第三项权利，即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有两个条件。

290. 第一，被告必须证明他无法支付法律协助费用。就此，他不需要“排除所有怀疑”；只要存在“一些迹象”表明即可，即“没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即可（[Pakelli v. Germany](#), § 34）。

291. 第二，“基于公平利益的考虑”，缔约国有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在对此进行判断时，要考虑整个案件的事实，这不仅包括法律援助申请的决定发布时的情形，还包括国内法院就案件实体问题作出决定时的情形（[Granger v. the United Kingdom](#), § 46）。

292. 在决定公平利益是否要求对被告提供免费的法律代理人时，法院需要考虑一系列要素，包括所涉及的罪行和刑罚的严重程度（[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60; [Quaranta v. Switzerland](#), § 33; [Zdravko Stanev v. Bulgaria](#), § 38）。原则上，涉及自由的剥夺时，司法公正要求被告有法律代理人（[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61; [Quaranta v. Switzerland](#), § 33; [Zdravko Stanev v. Bulgaria](#), § 38）。

293. “基于公平利益的考虑”测试的另一个条件是法院要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Quaranta v. Switzerland](#), § 34; [Pham Hoang v. France](#), § 40; [Twalib v. Greece](#), § 53）以及被告的个人情形（[Zdravko Stanev v. Bulgaria](#), § 38）。后一要求主要考虑被告出庭辩护其案件的能力——例如，对法院使用的语言或/和某一法律系统不熟悉——而没有获得法律协助（[Quaranta v. Switzerland](#), § 35; [Twalib v. Greece](#), § 53）。

294. 适用“公平利益”的要求时，测试得并不是法律援助的缺失是否对被告的造成了“实际损害”，而是另一个并不严格的测试：律师的帮助在特定情形下是否是合理的（[Artico v. Italy](#), § 34-35; [Alimena v. Italy](#), § 20）。

295. 尽管律师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很重要，但当涉及免费的法律援助时，由自己选择的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就需要受到某些限制。例如，在指派辩护律师时，法院必须考虑被告的意愿，但法院也可以不进行考虑，只要有相关充足的理由表明这是出于公平利益的需要（[Croissant v. Germany](#), § 29; [Lagerblom v. Sweden](#), § 54）。同样的，第六条第三款（c）项不能理解为赋予当事人更换公职辩护律师的权利（[Lagerblom v. Sweden](#), § 55, 59）。此外，罪犯在没有任何胜诉的可能时想要上诉，而其在一审中已根据第六条受到公正审判，那么司法公正并不意味着自动提供给该罪犯法律援助（[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7）。

(E) 实际有效的法律协助

296. 第六条第三款 (c) 项直接表明了获得“实际有效的”法律协助的权利，仅指派法律协助律师并不能保证该协助有有效的，因为指派的律师可能会死亡，可能会患上严重的疾病，可能会被长期禁止代理或者可能会逃避职责 (*Artico v. Italy*, § 33)。

297. 有效的法律协助的权利之一是被告有权单独与他的律师沟通。只有在例外情形下国家才可能限制被拘留的人和他的辩护律师秘密接触 (*Sakhnovskiy v. Russia* [GC], § 102)。如果一个律师不能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与他的客户商议或接受客户的秘密指示，那么他的协助基本是无用的 (*S. v. Switzerland*, § 48;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58)。对客户与律师接触的任何限制，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不能侵犯被告享有的获得有效法律协助的权利 (*Sakhnovskiy v. Russia* [GC], § 102)。对被告与其律师的电话交谈进行录音 (*Zagaria v. Italy*, § 36) 以及过分限制律师会见被告的次数和时间 (*Öcalan v. Turkey* [GC], § 135) 也可能违反保证有效协助的要求。

298. 然而，缔约国不能就被指派做法律协助的律师或者由被告选择的律师的任何问题承担责任 (*Lagerblom v. Sweden*, § 56; *Kamasinski v. Austria*, § 65)。考虑到法律职业的独立性，辩护的行为本质上是被告与其辩护人之间的事情；只有在律师不能有效代理的情形显而易见或者能够引起人足够注意时，缔约国才能介入 (*Kamasinski v. Austria*, § 65; *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 41; *Daud v. Portugal*, § 38)。律师不能为被告辩护 (*Artico v. Italy*, §§ 33, 36)，或者律师没有遵守重要的程序要求，而这又不是因为对辩护考虑不周或者论证时出现缺陷 (*Czekalla v. Portugal*, §§ 65, 71)，那么此时国家可能存在责任。

4. 第六条第三款 (d) 项

第六条第三款 (d) 项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d) 询问不利于他的证人，并在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具有相同的条件下，让有利于他的证人出庭接受询问；”

(A) “证人”的自治意义

299. 不考虑国内法律的分类，“证人”这一术语在公约体系下有其自治意义 (*Damir Sibgatullin v. Russia*, § 45; *S.N. v. Sweden*, § 45)。当证词对定罪可能有重要影响时，它就构成了控诉方的证据，受到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三款 (d) 项的保护 (*Kaste and Mathisen v. Norway*, § 53; *Lucà v. Italy*, § 41)。

300. 这一术语包括共同被告 (见，例如，*Trofimov v. Russia*, § 37)，受害者 (*Vladimir Romanov v. Russia*, § 97) 和专家证人 (*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81-82)。

301. 第六条第三款 (d) 项也可能适用于书面证据 (*Mirilashvili v. Russia*, §§ 158-159)。

(B) 询问证人的权利

(1) 一般原则

302. 第六条第三款 (d) 项规定的原则是：在被告被定罪之前，所有指控证据在被告出席公开审判中都要呈现，以便其能进行对抗。该原则可能存在例外情形，但例外情形不能侵害辩护权，这作为一项原则，要求不管在证人陈述之时或是之后的诉讼程序中，被告都应有足够适当的机会来挑战和质疑对他不利的证人 ([Hümmer v. Germany](#), § 38; [Lucà v. Italy](#), § 39; [Solakov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 57)。

303. 从上述一般原则中引申出来两个要求。第一，证人不出庭的理由必须充分。第二，如果定罪仅依靠一个人所做的证言或者该证言对定罪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被告不管是在调查过程中还是庭审过程中都没有机会进行质证，就认为对辩护权的限制过大以至于违反第六条的规定 (所谓的“决定性规则”) ([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19)。

304. 考虑到公正司法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任何限制辩护权的措施都应在严格必需的情况才能适用。如果一个较轻的限制措施能够适用，就必须适用较轻的限制措施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8)。

305. 被告能够在法官面前与重要证人对峙是公正诉讼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Tarău v. Romania](#), § 74; [Graviano v. Italy](#), § 38)。

(2) 提供合理措施确保证人出庭的义务

306. 在考虑证据是否是决定性的之前，需首先考虑证人不出庭理由是否充分。当证人不能出庭提供证据时，国家有义务了解他们不出庭的行为是否是正当的 ([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20; [Gabielyan v. Armenia](#), §§ 78, 81-84)。

307. 综合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要求缔约国采取积极措施保障被告能询问不利于他的证人 ([Trofimov v. Russia](#), § 33; [Sadak and Others v. Turkey \(no. 1\)](#), § 67)。

308. 当不能询问证人是由于证人未出席时，当局必须提供合理措施保证他们出席 ([Karpenko v. Russia](#), § 62; [Damir Sibgatullin v. Russia](#), § 51; [Pello v. Estonia](#), § 35; [Bonev v. Bulgaria](#), § 43)。

309. 然而，对于可能的事情没有人有责任；如果当局不能因其没有尽职努力提供被告询问证人的机会而被控诉，被告不能出庭不能认为诉讼需要中止 ([Gossa v. Poland](#), § 55; [Haas v. Germany](#) (dec.); [Calabrò v. Italy and Germany](#) (dec.); [Ubach Mortes v. Andorra](#) (dec.))。

(3) 对拒绝听取证人证言提供理由的义务

310. 尽管法院的职能并不包括对证据的相关性提出意见，拒绝询问或传唤被告而未提供正当理由相当于限制了辩护权，因而不符合公正诉讼的规定 (见 [Popov v. Russia](#), § 188; [Bocos-Cuesta v. the Netherlands](#), § 72; [Wierzbicki v. Poland](#), § 45; and [Vidal v. Belgium](#), § 34)。

(4) 依据在法庭上没有提出的证人证言

311. 在某些情形下可能需要参考调查阶段获得的证言 ([Lucà v. Italy](#), § 40); 例如, 证人已经死亡([Mika v. Sweden](#) (dec.), § 37; [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 52)或者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Vidgen v. the Netherlands](#), § 47; [Sofr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Craxi v. Italy](#) (no. 1), § 86), 或者当局所提供的保证证人出庭的合理措施都失败了([Mirilashvili v. Russia](#), § 217)。

312. 考虑到证人缺席对辩护权不利影响的程度, 如果证人在之前的诉讼中没有被询问, 那么采纳证人证词而替代庭审现场向证人取证必须作为最后诉诸手段 ([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25)。

313. 当辩护权的保护程度无法达到公约的要求时, 应当十分谨慎对待证人提供的证据 ([S.N. v. Sweden](#), § 53; [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6)。

314. 如果出于正当理由无法对证人进行对抗制询问, 那么国内法院就需要考虑证人在审前阶段的陈述, 只要这些陈述有其他证据相印证 ([Mirilashvili v. Russia](#), § 217; [Scheper v. the Netherlands](#) (dec.); [Calabrò v. Italy and Germany](#) (dec.); [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 52)。

315. 在某些情形下证人证言未在审判中采纳, 而该证言又对定罪起主要或者决定作用时, 第六条第三款(d)项可能要求交叉询问证人(见 [Kok v. the Netherlands](#) (dec.); [Krasniki v. the Czech Republic](#), § 79)。

316. 即使传闻陈述是不利于被告的唯一或决定性证据, 将它作为证据加以采纳并不自动导致违反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然而, 定罪仅依据未出席证人的陈述或者该陈述对定罪有决定作用的情形将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要素, 并需要足够充分的因素与之抗衡, 包括有强有力的程序保障措施。每个案件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是否存在充分的抗衡因素, 包括允许对证据的可靠性进行公平合理评估的措施。鉴于证据在案件中的重要性, 只有在充分可靠的情况下才允许将其作为定罪依据([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GC], §147)。

(5) 匿名证人

317. 尽管匿名证人问题和证人缺席问题并不一样, 但这两种情形原则上没有区别, 因为它们都对被告有潜在的不利。而基本原则是刑事诉讼的被告应有充足的机会来质疑对他不利的证据([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27)。

318. 使用匿名证人证言确定罪行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违反公约规定 ([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69;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2; [Krasniki v. the Czech Republic](#), § 76)。

319. 尽管第六条并没有明确要求考虑证人的利益, 但证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可能受到威胁, 而这些利益一般落入公约第八条的范围之内。缔约国在组织刑事诉讼程序时应保证这些利益不受到不合理的损害。因此, 公正诉讼的原则要求在适当的情形下, 辩护人的利益和被传唤作证的证人和受害者的利益需保持平衡([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0;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3)。

320.对某些证人的身份进行保密时，国家当局必须提出相关充分的理由 ([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1; [Visser v. the Netherlands](#), § 47; [Sapunarescu v. Germany](#) (dec.); 和 [Dzelili v. Germany](#) (dec.))。

321. 如果控方证人身份一直保密，那么辩护就可能存在一些刑事诉讼过程中一般不会存在的困难。在这类情形下，辩护存在的困难必须通过司法机关开展的程序才能足以抵消([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2;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4; [Haas v. Germany](#) (dec.))。

322.特别是，不能阻止申请人质疑匿名证人的可靠性 ([Birutis and Others v. Lithuania](#), § 29;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9 和 62; [Kostovski v. the Netherlands](#), § 42)。

323.此外，在评估有关质疑匿名证人时遵循的程序是否足以抵消对辩护造成的困难时，要特别考虑匿名证言对申请人罪行的决定性程度。如果证言并不具有决定性，那么对辩护造成的困难就相对较低([Kok v. the Netherlands](#) (dec.); [Krasniki v. the Czech Republic](#), § 79)。

(6) 性侵犯案件中的证人

324. 有关性侵犯的刑事程序经常被受害人认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后者不愿面对被告。当涉及未成年人时，这一情形就更加明显。在评估这类程序中的被告是否受到公正审判时，必须考虑受害人所享有的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因此，在有关性侵犯的刑事程序中，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来保护受害人，但这些措施不能妨碍辩护权有效充分行使。在保障辩护权时，司法机关可能需要采取措施来抵消对辩护造成的困难 ([Aigner v. Austria](#), § 37; [D. v. Finland](#), § 43; [F. and M. v. Finland](#), § 58; [Accard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S.N. v. Sweden](#), § 47; [Vronchenko v. Estonia](#), § 56)。

325. 考虑到性侵犯刑事程序的特殊性，第六条第三款 (d) 项不能解释为：要求在所有案件中，被告或其辩护律师能够通过交叉询问或其他方式进行直接询问 ([S.N. v. Sweden](#), § 52; [W.S. v. Poland](#), § 55)。

326. 必须能让被告观察证人在被询问时的行为表现，并且能够让被告质疑证人的陈述和可信度 ([Bocos-Cuesta v. the Netherlands](#), § 71; [P.S. v. Germany](#), § 26; [Accard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S.N. v. Sweden](#), § 52)。

327.仅通过视频资料了解证人提供的理由并不能足以保障辩护权，因为当局并没有提供对证人证言进行提问的机会 ([D. v. Finland](#), § 50; [A.L. v. Finland](#), § 41)。

(7) 提供证人有利的条件以换取其陈述

328. 提供豁免或其他有利条件以换得证人陈述是国内机构打击严重罪行的重要手段。然而，对这类陈述的使用可能会对程序的公正产生影响，也可能出现一些细微的问题，例如，本质上，这类陈述易受到操控，证人作出这类陈述可能只是为了换取有利条件或进行报复。因此，不能低估这类陈述的模糊性以及一个人可能基于未经证实的不公指控而受到审判的风险。然而，使用这类陈述本身并不一定导致程序的不公正 ([Cornelis v. the Netherlands](#) (dec.),存在其他引用)。

(8) 传闻证据

329. 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以及第三款 (d) 项推定在刑事程序中排除对被告不利的传闻证据。当证据可能对辩护有利时，也需排除对传闻证据的使用([Thomas v. United Kingdom](#) (dec.))。

(9) 被告有权要求法院传唤证人

330. 国内法院应对证据以及被告试图引用的证据相关性进行评估，这是一项一般原则。第六条第三款（d）项留给国内法院来评估是否需要传唤证人，这也是一项一般原则。它不要求基于被告的利益使每个证人都出席并接受询问；根据“*相同条件下*”的规定，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就此问题实现双方的“两造平等”（见，其中一些案例，[Perna v. Italy](#) [GC], § 29; [Solakov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 57）。

331. 据此，被告仅控诉其不能询问某些证人是不足的；他必须在上述控诉之外，解释当面听取证人证言的重要性及理由，同时还需表明这些证言对于确定事实真相和保障辩护权是必要的，从而支持其请求（[Perna v. Italy](#) [GC], § 29; [Bacanu and SC R S.A. v. Romania](#), § 75）。

332. 当被告要求询问证人的要求并不过分，有充分的理由，与被指控的主要罪行存在相关性，且能增强辩护力度甚至表明其无罪，那么国内司法机关必须就驳回这一要求的决定提供相关理由（[Topić v. Croatia](#), § 42; [Polyakov v. Russia](#), §§ 34-35）。

333. 对于保证证人出庭，第六条并不赋予被告无限制的权利。一般来说，由国内法院来决定询问证人是否是必要的或适当的（见，例如，[S.N. v. Sweden](#), § 44; [Accard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334. 可能存在一些例外情形促使法院认定证人没有接受询问违反第六条规定（[Dorokhov v. Russia](#), § 65; [Popov v. Russia](#), § 188; [Bricmont v. Belgium](#), § 89）。

5. 第六条第三款（e）项

第六条第三款（e）项

“凡受刑事罪名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e）如果他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可以请求免费的译员协助翻译；”

(A) “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

335. 获得译员免费帮助的权利只适用被告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的情形（[K. v. France](#) (dec.)）。被告懂得工作语言时，就不能执意要求获得译员的帮助并要求法院准许他通过另一种语言进行辩护，这种语言包括他所属的少数民族的语言（[K. v. France](#) (dec); [Bideault v. France](#) (dec); cf. also [Lagerblom v. Sweden](#), § 62）。

336. 被告有代理律师的情况下，仅律师知晓法院使用的工作语言而本人不知晓是不够的。因为包括参与审讯权的公正诉讼权要求被告能够理解诉讼程序并能够告知其律师在哪一点上进行辩护，所以对诉讼程序的翻译是必需的（[Kamasinski v. Austria](#), § 74; [Cusc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337. 第六条第三款（e）项并不涉及被告和其律师的关系，只适用于被告和法官的关系（[X. v. Austria](#) (dec.), p. 68）。

338. 可以放弃获得译员的权利，但是这必须是被告自己的决定，而非其律师（[Kamasinski v. Austria](#), § 80）。

(B) 刑事程序中所保护的内容

339. 第六条第三款（e）项保障获得免费译员协助翻译或解释诉讼程序中所有文件或陈述的权利，这项权利对于被告理解内容或将自己的意思翻译成法院语言非常重要，这样

才能使被告受益于公正审判权 ([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 48; [Ucak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Hermi v. Italy](#) [GC], § 69; [Lagerblom v. Sweden](#), § 61)。

340. 第六条第三款 (e) 项不仅适用于庭审中所做的口头陈述, 也适用于书面材料和庭前程序 ([Kamasinski v. Austria](#), § 74; [Hermi v. Italy](#) [GC], § 70)。

341. 然而, 这并不要求对程序中所有书面证据或官方文件提供书面翻译 ([Kamasinski v. Austria](#), § 74)。例如, 缺乏对判决的书面翻译本身并不违反第六条第三款(e)项的规定 ([Kamasinski v. Austria](#), § 85)。第六条第三款(e)项提到的是“口译”而非“笔译”。这表明一个口头的语言协助人员就能满足公约的要求([Husain v. Italy](#) (dec.); [Hermi v. Italy](#) [GC], § 70)。

342. 总之, 所提供的协助翻译应能使被告了解针对他的案件并为自己辩护, 尤其是能向法庭描述他/她口中的事件 ([Kamasinski v. Austria](#), § 74; [Hermi v. Italy](#) [GC], § 70; [Güngör v. Germany](#) (dec.); [Protopapa v. Turkey](#), § 80)。

(C) “免费”协助

343. 提供“免费”协助的义务并不取决于被告; 相反, 缔约国在建立国内刑事司法制度时, 为被告提供翻译服务是所要求提供便利条件的一部分。然而, 如果提供给被告的译员没有出席, 被告可能控告对该译员提出控告([Fedele v. Germany](#) (dec.))。

344. 不能在之后重新宣布翻译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 46)。将第六条第三款(e)项理解准许国内法院让罪犯承担费用相当于限制了本条款的权利([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 42; [Işyar v. Bulgaria](#), § 45; [Öztürk v. Germany](#), § 58)。

(D) 翻译的条件

345. 不宜由第六条第三款 (e) 项列出有关译员为被告提供帮助的具体方法。译员并不是第六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法院或审判庭中的一员, 因此对其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也就没有正式的要求。译员所提供的服务必须能有效帮助被告进行辩护, 同时译员的行为不能影响程序的公正([Ucak v. the United Kingdom](#))。

(E) 积极义务

346. 确认申请人是否需要翻译设备是法官在询问申请人后需要决定的, 特别是当法官被告知律师难以与申请人沟通时。法官要意识到未提供译员将不会妨碍申请人对自己至关重要事项的充分参与([Cusc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347. 尽管辩护的行为本质上是被告和其律师之间的事情, 但国内法院才是对程序公正的最后保障—包括, 其中一项是, 对非本国被告可能不提供翻译和解释 ([Cusc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 39; [Hermi v. Italy](#) [GC], § 72; [Katritsch v. France](#), § 44)。

348. 被告的语言水平非常重要, 但法院也必须审查被告被指控的罪行的本质以及国内机构所提供给他的手段, 从而评估案件是否如此复杂以致于需要对法院使用的语言有足够的了解 ([Hermi v. Italy](#) [GC], § 71; [Katritsch v. France](#), § 41; [Şaman v. Turkey](#), § 30; [mutatis mutandis, Güngör v. Germany](#) (dec))。

349. 考虑到第六条第三款 (e) 项所保障的权利需实际有效, 主管机关的义务不仅包括对译员的聘请, 还可能包括, 在他们注意到的情形下, 对之后所提供的译员是否胜任进行一定的管理 ([Kamasinski v. Austria](#), § 74; [Hermi v. Italy](#) [GC], § 70; [Protopapa v. Turkey](#), § 80)。

IV. 第六条的域外效力

350. 公约并不要求缔约方将其标准适用于第三个国家和地区 ([Drozd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 110)。例如, 缔约方没有义务确定引渡到第三国后的审判是否符合第六条的所有规定。

(1) 公然拒绝司法

351. 然而, 根据法院的判例法, 当引渡或驱逐的决定做出, 但个人在请求国的公正诉讼权可能受到公然剥夺, 例如公然违背司法, 那么就会产生第六条的问题。这一规则第一次出现在[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 (§ 113)中, 之后在法院的其他案件中被确认 (见, 例如, [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 [GC], §§ 90-91; [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 149; [Ahorugeze v. Sweden](#), § 115;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58)。

352. “公然违背司法”这一术语的近似含义是: 审判明显违反第六条规定以及所包含的规则 (见, 其中一些案例, [Sejdovic v. Italy](#) [GC], § 84; [Stoichkov v. Bulgaria](#), § 56; [Drozd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 110)。尽管目前没有要求对这一术语做准确的定义, 但法院表示某些不公正形式等同于公然违背司法。这些形式包括:

— 缺席定罪且之后不存在对指控实体问题作出决定的可能 ([Einhorn v. France](#) (dec.), § 33; [Sejdovic v. Italy](#) [GC], § 84; [Stoichkov v. Bulgaria](#), § 56);

— 本质上是一个总结性的审判且完全忽略了被告的权利 ([Bader and Kanbor v. Sweden](#), § 47);

— 拘留后, 无法要求一个独立公正的审判庭来审查拘留的合法性 ([Al-Moayad v. Germany](#) (dec.), § 101);

— 系统全面的拒绝被告接触律师, 特别是当被告在外国被拘留时 (同上);

— 在刑事程序中使用对嫌疑犯以及其他进行违反第三条的对待而获得的陈述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67; [El Haski v. Belgium](#), § 85)

353. 自Soering案件后, 法院花了20年的时间——也就是2012年法院对[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作出的决定——才第一次确认引渡或驱逐可能在事实上违反了第六条。这表明, 也正如前段所举案例中所显示的那样, “公然违背司法”的测试非常严格。仅在诉讼程序中违规或者缺乏保障措施等如果发生在缔约国内, 可能构成违法第六条的规定, 而“公然违背司法”的标准要高于此。所要求的是: 对第六条所保障的公正诉讼权原则的违反如此之深以至于使该条款所保护的权利归于无效或其本质被损([Ahorugeze v. Sweden](#), § 115;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60)。

(2) “实际风险”的标准以及举证责任

354. 在审查引渡或驱逐是否相当于公然违反司法时, 法院认为应使用与审查第三条下的引渡和驱逐相同的标准和举证责任。由此, 申请人需要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存在实质理由表明如果离开缔约国他将遭受公然违背司法的实质风险。被告举证后, 就需要由政府来证明风险不存在([Ahorugeze v. Sweden](#), § 116;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72-280; [El Haski v. Belgium](#), § 86; 比照, [Saadi v. Italy](#) [GC], § 129)。

355. 为了决定公然违背司法的情形是否存在, 法院必须考虑接收国的情形以及申请人的情况以审查将申请人送回接收国的可能后果 ([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 125; 比照, [Saadi v. Italy](#) [GC], § 130)。对风险的评估必须首先考虑缔约国在驱

逐之时了解或应当了解的事实([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 125; 比照 [Saadi v. Italy](#) [GC], § 133)。当案件被审理之时驱逐或转移已经发生，法院仍然要考虑随后产生的信息([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 149; [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 [GC], § 69)。

引用案例列表

指南中引用的判例指的是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以及欧洲人权委员会的裁定和报告。

除非另有说明，所提到的都是法院审判庭对案件实质做出的判决。缩写“（dec）”表示引用的是法院的裁定，“[GC]”表示案件由大审判庭审理。

指南电子版中的案例链接指向HUDOC数据库（<http://hudoc.echr.coe.int>），该数据库可查询法院的判例法（大审判庭、审判庭以及委员会的判决和裁定，案例信息说明中的咨询意见以及法律摘要）案件的评议以及委员会的裁定和报告，还有部长委员会的决议。

本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均以英文和法文两种官方语言发布。Hudoc数据库也包含多达30多种非官方语言重要案件的翻译文本，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近百个在线案例收藏的链接。

A. v. Austria (dec.), no. 16266/90, 7 May 1990
A.L. v. Finland, no. 23220/04, 27 January 2009
A.L. v. Germany, no. 72758/01, 28 April 2005
A. Menarini Diagnostics S.R.L. v. Italy, no. 43509/08, 27 September 2011*
Abdoella v. the Netherlands, 25 November 1992, Series A no. 248-A
Accard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no. 30598/02, ECHR 2005-II
Adiletta and Others v. Italy, 19 February 1991, Series A no. 197-E
Adolf v. Austria, no. 8269/78, 26 March 1982, series A no. 49
AGOSI v. the United Kingdom, 24 October 1986, Series A no. 108
Ahorugeze v. Sweden, no. 37075/09, 27 October 2011
Aigner v. Austria, no. 28328/03, 10 May 2012
Air Can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5 May 1995, Series A no. 316-A
Akay v. Turkey (dec.), no. 34501/97, 19 February 2002*
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nos. 7299/75 and 7496/76, 10 February 1983, Series A no. 58
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s. 26766/05 and 22228/06, ECHR 2011
Al-Moayad v. Germany (dec), no. 35865/03, 20 February 2007
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61498/08, ECHR 2010
Ali v. Romania, no. 20307/02, 9 November 2010
Alimena v. Italy, 19 February 1991, Series A no. 195-D
A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8539/99, ECHR 2002-IX
Allen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25424/09, ECHR 2013
Allenet de Ribemont v. France, 10 February 1995, Series A no. 308
Arrigo and Vella v. Malta (dec.), no. 6569/04, 10 May 2005
Artico v. Italy, 13 May 1980, Series A no. 37
Assanidze v. Georgia [GC], no. 71503/01, ECHR 2004-II
Averill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6408/97, ECHR 2000-VI
B. v. Austria, 28 March 1990, Series A no. 175
B. and P.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36337/97, 35974/97, ECHR 2001-III
Bacanu and SC R S.A. v. Romania, no. 4411/04, 3 March 2009
Bäckström and Andersson v. Sweden (dec.), no. 67930/01, 5 September 2006
Bader and Kanbor v. Sweden, no. 13284/04, ECHR 2005-XI
Baggetta v. Italy, 25 June 1987, Series A no. 119
Balsyte-Lideikiene v. Lithuania, no. 72596/01, 4 November 2008
Bannikova v. Russia, no. 18757/06, 4 November 2010
Barberà, Messegué and Jabardo v. Spain, no. 10590/83, 6 December 1988, Series A no. 146

Baucher v. France, no. 53640/00, 24 July 2007*
Belashev v. Russia, no. 28617/03, 4 December 2008
Belilos v. Switzerland, no. 10328/83, 29 April 1988, Series A no. 132
Bellerín Lagares v. Spain (dec.), no. 31548/02, 4 November 2003*
Bendenoun v. France, 12547/86, 24 February 1994, Series A no. 284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10 June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Berlinski v. Poland, nos. 27715/95 and 30209/96, 20 June 2002
Bideault v. France (dec.), no. 11261/8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December 1987, DR 48, p. 232
Birutis and Others v. Lithuania, nos. 47698/99 and 48115/99, 28 March 2002
Block v. Hungary, no. 56282/09, 25 January 2011
Bobek v. Poland, no. 68761/01, 17 July 2007
Bocos-Cuesta v. the Netherlands, no. 54789/00, 10 November 2005
Boddaert v. Belgium, 12 October 1992, Series A no. 235-D
Böhmer v. Germany, no. 37568/97, 3 October 2002
Boldea v. Romania, no. 19997/02, 15 February 2007
Bonev v. Bulgaria, no. 60018/00, 8 June 2006
Bonisch v. Austria, 6 May 1985, Series A no. 92
Bonzi v. Switzerland, no. 7854/77,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2 July 1978, DR 12, p.188
Boulois v. Luxembourg [GC], no. 37575/04, 3 April 2012, ECHR 2012
Borisova v. Bulgaria, no. 56891/00, 21 December 2006
Borgers v. Belgium, 30 October 1991, Series A no. 214-B
Brandstetter v. Austria, 28 August 1991, Series A no. 211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9846/98, ECHR 2001-X
Bricmont v. Belgium, no. 10857/84, 7 July 1989, Series A no. 158
Brozicek v. Italy, no. 10964/84, 19 December 1989, Series A no. 167
Brusco v. France, no. 1466/07, 14 October 2010
Buijen v. Germany, no. 27804/05, 1 April 2010
Bulut v. Austria, 22 February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
Burak Hun v. Turkey, no. 17570/04, 15 December 2009
Buscemi v. Italy, no. 29569/95, ECHR 1999-VI
Butkevicius v. Lithuania, no. 48297/99, ECHR 2002-II (extracts)
Bykov v. Russia [GC], no. 4378/02, 10 March 2009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7819/77 and 7878/77, 28 June 1984, Series A no. 80
C. v. Italy, no. 10889/8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1 May 1988, DR 56, p. 40
C.G.P. v. the Netherlands, no. 29835/96,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5 January 1997
Calabrò v. Italy and Germany (dec.), no. 59895/00, ECHR 2002-V
Caldas Ramirez de Arrellano v. Spain (dec.), no. 68874/01, ECHR 2003-I (extracts)
Can v. Austria, no. 9300/81, Commission's report of 12 July 1984, Series A no. 96
Capeau v. Belgium, no. 42914/98, ECHR 2005-I
Casse v. Luxembourg, no. 40327/02, 27 April 2006*
Castillo Algar v. Spain, 28 Octo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I
Célice v. France, no. 14166/09, 8 March 2012
Chichlian and Ekindjian v. France, no. 10959/84, Commission report of 16 March 1989, Series A no. 162-B*
Clarke v. United Kingdom (dec.), no. 23695/02, 25 August 2005
Clinique Mozart SARL v. France, no. 46098/99, 8 June 2004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nos. 32492/96, 32547/96, 32548/96, 33209/96 and 33210/96, ECHR 2000-VII

Collozza and Rubinat v. Italy, no. 9024/80, Commission report of 5 May 1983, Series A no. 89
Constantin and Stoian v. Romania, nos. 23782/06 and 46629/06, 29 September 2009
Cooper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48843/99, 16 December 2003
Cornelis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994/03, ECHR 2004-V (extracts)
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dec.), no. 48188/99, ECHR 2001-XII
C. P. and Others v. France, no. 36009/97, 1 August 2000*
Craxi v. Italy (no. 1), no. 34896/97, 5 December 2002*
Croissant v. Germany, 25 September 1992, Series A no. 237-B
Cusc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2771/96, 24 September 2002
Czekalla v. Portugal, no. 38830/97, ECHR 2002-VIII
D. v. Finland, no. 30542/04, § 43, 7 July 2009
Daktaras v. Lithuania, no. 42095/98, ECHR 2000-X
Daktaras v. Lithuania (dec.), no. 42095/98, 11 January 2000
Dallos v. Hungary, no. 29082/95, 1 March 2001, ECHR 2001-II
Damir Sibgatullin v. Russia, no. 1413/05, 24 April 2012
Daud v. Portugal, 21 April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
Davran v. Turkey, no. 18342/03, 3 November 2009
Dayanan v. Turkey, no. 7377/03, 13 October 2009
De Cubber v. Belgium, 26 October 1984, Series A no. 86
Delcourt v. Belgium, 17 January 1970, Series A no. 11
Demicoli v. Malta, no. 13057/87, 27 August 1991, Series A no. 210
Deweert v. Belgium, no. 6903/75, 27 February 1980, Series A no. 35
De Salvador Torres v. Spain, 24 Octo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
Didu v. Romania, no. 34814/02, 14 April 2009*
Diriöz v. Turkey, no. 38560/04, 31 May 2012
Dobbertin v. France, 25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6-D
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no. 20524/92, 26 March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
Dorokhov v. Russia, no. 66802/01, 14 February 2008
Dorozhko and Pozharskiy v. Estonia, nos. 14659/04 and 16855/04, 24 April 2008
Döry v. Sweden, no. 28394/95, 12 November 2002
Dowsett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9482/98, ECHR 2003-VII
Drassich v. Italy, no. 25575/04, 11 December 2007*
Drozd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26 June 1992, Series A no. 240
Dubus S.A. v. France, no. 5242/04, 11 June 2009*
Dzelili v. Germany (dec.) no. 15065/05, 29 September 2009
Eckle v. Germany, no. 8130/78, 15 July 1982, series A no. 51
Edwards and Lew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s. 39647/98, 40461/98, 27 October 2004, ECHR 2004-X
Einhorn v. France (dec.), no. 71555/01, ECHR 2001-XI
El Haski v. Belgium, no. 649/08, 25 September 2012
Enea v. Italy [GC], no. 74912/01, ECHR 2009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nos. 5100/71, 5101/71, 5102/71, 5354/72 and 5370/72, 8 June 1976, Series A no. 22
Erdogan v. Turkey, no. 14723/89,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July 1992, DR 73, p. 81
Ergin v. Turkey (no. 6), no. 47533/99, ECHR 2006-VI (extracts)
Eurofinacom v. France (dec.), no. 58753/00, ECHR 2004-VII
Ezeh and Conno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s. 39665/98 and 40086/98, 9 October 2003, ECHR 2003-X

F. and M. v. Finland, no. 22508/02, 17 July 2007
Falk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66273/01, ECHR 2004-XI
Fatullayev v. Azerbaijan, no. 40984/07, 22 April 2010
Fazliyski v. Bulgaria, no. 40908/05, 16 April 2013
Fedele v. Germany (dec.), no. 11311/84, 9 December 1987
Fejde v. Sweden, 29 October 1991, Series A no. 212-C
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7 August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Fey v. Austria, 24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5-A
Filippini v. San Marino (dec.), no. 10526/02, 28 August 2003*
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25 Februar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
Fischer v. Austria (dec.), no. 27569/02, ECHR 2003-VI
Foucher v. France, 18 March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
Fruni v. Slovakia, no. 8014/07, 21 June 2011
Funke v. France, 25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6-A
G.B. v. France, no. 44069/98, ECHR 2001-X
Gabrielyan v. Armenia, no. 8088/05, 10 April 2012
Gäfgen v. Germany [GC], no. 22978/05, ECHR 2010
Galstyan v. Armenia, no. 26986/03, 15 November 2007
Garycki v. Poland, no. 14348/02, 6 February 2007
Gast and Popp v. Germany, no. 29357/95, ECHR 2000-II
Geerings v. the Netherlands, no. 30810/03, ECHR 2007-III
Giosakis v. Greece (no. 3), no. 5689/08, 3 May 2011*
Goddi v. Italy, no. 8966/80, 9 April 1984, Series A no. 76
Goktepe v. Belgium, no. 50372/99, 2 June 2005*
Gorgiladze v. Georgia, no. 4313/04, 20 October 2009*
Gossa v. Poland, no. 47986/99, 9 January 2007
Gómez de Liaño y Botella v. Spain, no. 21369/04, 22 July 2008*
Gradinger v. Austria, 23 October 1995, Series A no. 328-C
Granger v. the United Kingdom, 28 March 1990, Series A no. 174
Graviano v. Italy, no. 10075/02, 10 February 2005*
Grayson and Bar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19955/05 and 15085/06, 23 September 2008
Gregačević v. Croatia, no. 58331/09, 10 July 2012
Grievie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57067/00, ECHR 2003-XII (extracts)
Guérin v. France, 29 Jul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
Guisset v. France, no. 33933/96, ECHR 2000-IX
Güngör v. Germany (dec.), no. 31540/96, 24 January 2002*
Gurguchiani v. Spain, no. 16012/06, 15 December 2009
Haas v. Germany (dec.), no. 73047/01, 17 November 2005
Hadjianastassiou v. Greece, no. 12945/87, 16 December 1992, Series A no. 252
Hamer v. Belgium, no. 21861/03, ECHR 2007-V (extracts)
Hanif and Kh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52999/08 and 61779/08, 20 December 2011
Harabin v. Slovakia, no. 58688/11, 20 November 2012
Harutyunyan v. Armenia, no. 36549/03, ECHR 2007-III
Hauschildt v. Denmark, 24 May 1989, Series A no. 154
Heaney and McGuinness v. Ireland, no. 34720/97, ECHR 2000-XII
Heglas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5935/02, 1 March 2007
Henryk Urban and Ryszard Urban v. Poland, no. 23614/08, 30 November 2010

Hermi v. Italy [GC], no. 18114/02, ECHR 2006-XII
Holm v. Sweden, 25 November 1993, Series A no. 279-A
Hümmer v. Germany, no. 26171/07, 19 July 2012
Husain v. Italy (dec.), no. 18913/03, ECHR 2005-III
Hüseyin Turan v. Turkey, no. 11529/02, 4 March 2008
Huseyn and Others v. Azerbaijan, nos. 35485/05, 45553/05, 35680/05 and 36085/05, 26 July 2011
I.A. v. France, 23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
I.H. and Others v. Austria, no. 42780/98, 20 April 2006
Iglin v. Ukraine, no. 39908/05, 12 January 2012
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24 November 1993, Series A no. 275
Incal v. Turkey, 9 June 1998, *Reports* 1998-IV
Ibrahim Ülger v. Turkey, no. 57250/00, 29 July 2004*
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18 January 1978, Series A no. 25
Ismoilov and Others v. Russia, no. 2947/06, 24 April 2008
Işyar v. Bulgaria, no. 391/03, 20 November 2008
Jalloh v. Germany [GC], no. 54810/00, ECHR 2006-IX
Janosevic v. Sweden, no. 34619/97, ECHR 2002-VII
Jasper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27052/95, 16 February 2000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8 February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
Jorgic v. Germany, no. 74613/01, 12 July 2007, ECHR 2007-III
Josseaume v. France, no. 39243/10, 8 March 2012
Judge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35863/10, 8 February 2011
Juha Nuutinen v. Finland, no. 45830/99, 24 April 2007
Jussila v. Finland [GC], no. 73053/01, 23 November 2006, ECHR 2006-XIV
K. v. France, no. 10210/82, Commission decision of 7 December 1983, DR 35, p. 203
Kamasinski v. Austria, no. 9783/82, 19 December 1989, Series A no. 168
Karpenko v. Russia, no. 5605/04, 13 March 2012
Kaste and Mathisen v. Norway, nos. 18885/04, 21166/04, 9 November 2006, ECHR 2006-XIII
Kart v. Turkey [GC], no. 8917/05, ECHR 2009 (extracts)
Katritsch v. France, no. 22575/08, 4 November 2010
Khalfaoui v. France, no. 34791/97, ECHR 1999-IX
Kh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5394/97, ECHR 2000-V
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nos. 11082/06 and 13772/05, 25 July 2013
Khudobin v. Russia, no. 59696/00, ECHR 2006-XII (extracts)
Khuzhin and Others v. Russia, no. 13470/02, 23 October 2008
Klimentyev v. Russia, no. 46503/99, 16 November 2006
Klouvi v. France, no. 30754/03, 30 June 2011*
Kok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43149/98, ECHR 2000-VI
König v. Germany, no. 6232/73, 28 June 1978, Series A no. 27
Konstantin Markin v. Russia [GC], no. 30078/06, ECHR 2012 (extracts)
Konstas v. Greece, no. 53466/07, 24 May 2011
Kontalexis v. Greece, no. 59000/08, 31 May 2011*
Kostovski v. the Netherlands, 20 November 1989, Series A no. 166
Krasniki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51277/99, 28 February 2006)
Kremzow v. Austria, 21 September 1993, Series A no. 268-B
Krestovskiy v. Russia, no. 14040/03, 28 October 2010
Kriegisch v. Germany (dec.), no. 21698/06, 23 November 2010

Kröcher and Möller v. Switzerland, no. 8463/78,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July 1981, DR 26
Krombach v. France, no. 29731/96, ECHR 2001-II
Kulikowski v. Poland, no. 18353/03, 19 May 2009
Kuopila v. Finland, no. 27752/95, 27 April 2000
Kuzmin v. Russia, no. 58939/00, 18 March 2010*
Kyprianou v. Cyprus [GC], no. 73797/01, ECHR 2005-XIII
Labergere v. France, no. 16846/02, 26 September 2006
Lacadena Calero v. Spain, no. 23002/07, 22 November 2011*
Lagerblom v. Sweden, no. 26891/95, 14 January 2003
Lanz v. Austria, no. 24430/94, 31 January 2002
Lauko v. Slovakia, 2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
Lavents v. Latvia, no. 58442/00, 28 November 2002
Legillon v. France, no. 53406/10, 10 January 2013
Lilly v. France (dec.), no. 53892/00, 3 December 2002*
Löffler v. Austria, no. 30546/96, 3 October 2000
Lucà v. Italy, no. 33354/96, ECHR 2001-II
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28 November 1978, Series A no. 29
Lundkvist v. Sweden (dec.), no. 48518/99, ECHR 2003-XI
Lutz v. Germany, no. 9912/82, 25 August 1987, Series A no. 123
Maaouia v. France [GC], no. 39652/98, ECHR 2000-X
Magee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28135/95, ECHR 2000-VI
Makhfi v. France, no. 59335/00, 19 October 2004*
Malige v. France, 23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
Malininas v. Lithuania, no. 10071/04, 1 July 2008
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 [GC], nos. 46827/99 and 46951/99, ECHR 2005-I
Marpa Zeeland B.V. and Metal Welding B.V. v. the Netherlands, no. 46300/99, ECHR 2004-X (extracts)
Marti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0426/98, 24 October 2006
Martinie v. France [GC], no. 58675/00, ECHR 2006-VI
Matijsevic v. Serbia, no. 23037/04, 19 September 2006
Mattick v. Germany (dec.), no. 62116/00, ECHR 2005-VII
Mattocchia v. Italy, no. 23969/94, ECHR 2000-IX
Matyjek v. Poland, no. 38184/03, 24 April 2007
Mayzit v. Russia, no. 63378/00, 20 January 2005
McFarlane v. Ireland [GC], no. 31333/06, 10 September 2010
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 [GC], nos. 32911/96, 35237/97 and 34595/97, ECHR 2002-VII
Melin v. France, 22 June 1993, Series A no. 261-A
Micallef v. Malta [GC], no. 17056/06, ECHR 2009
Mieg de Boofzheim v. France (dec.), no. 52938/99, ECHR 2002-X
Mika v. Sweden (dec.), no. 31243/06, 27 January 2009
Milasi v. Italy, 25 June 1987, Series A no. 119
Miliniene v. Lithuania, no. 74355/01, 24 June 2008
Miller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45825/99, 45826/99 and 45827/99, 26 October 2004
Mimoshvili v. Russia, no. 20197/03, 28 June 2011
Minelli v. Switzerland, no. 8660/79, 25 March 1983, Series A no. 62
Mircea v. Romania, no. 41250/02, 29 March 2007*
Mirilashvili v. Russia, no. 6293/04, 11 December 2008
Monedero Angora v. Spain (dec.), no. 41138/05, ECHR 2008
Monnell and Morris v. United Kingdom, nos. 9562/81 and 9818/82, 2 March 1987

Montcornet de Caumont v. France, (dec.), no. 59290/00, ECHR 2003-VII
Montera v. Italy (dec.), no. 64713/01, 9 July 2002*
Moiseyev v. Russia, no. 62936/00, 9 October 2008
Mouillet v. France, (dec.), no. 27521/04, 13 September 2007
Mezmaric v. Croatia, no. 71615/01, 15 July 2005
Mustafa Kamal Mustafa (Abu Hamza) (No. 1)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31411/07, 18 January 2011
Natunen v. Finland, no. 21022/04, 31 March 2009
Navone and Others v. Monaco, nos. 62880/11, 62892/11 and 62899/11, 24 October 2013
Nerattini v. Greece, no. 43529/07, 18 December 2008
Nešťák v. Slovakia, no. 65559/01, 27 February 2007
Neumeister v. Austria, 27 June 1968, Series A no. 8
Nicoleta Gheorghe v. Romania, no. 23470/05, 3 April 2012
Ninn-Hansen v. Denmark (dec.), no. 28972/75, ECHR 1999-V
Nortier v. the Netherlands, 24 August 1993, Series A no. 267
Nurmagomedov v. Russia, no. 30138/02, 7 June 2007
O. v. Norway, no. 29327/95, ECHR 2003-II
OAo Neftyanaya Kompaniya Yukos v. Russia, no. 14902/04, 20 September 2011
Oberschlick v. Austria (no. 1), 23 May 1991, Series A no. 204
Öcalan v. Turkey [GC], no. 46221/99, ECHR 2005-IV
Öcalan v. Turkey (dec.), no. 5980/07, 6 July 2010
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s. 15809/02 and 25624/02, ECHR 2007-VIII
Omar v. France, 29 Jul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8139/09, ECHR 2012
Öztürk v. Germany, no. 8544/79, 21 February 1984, Series A no. 73
P.G. and J.H.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4787/98, ECHR 2001-IX
P.S. v. Germany, no. 33900/96, 20 December 2001
Padin Gestoso v. Spain (dec.), no. 39519/98, ECHR 1999-II (extracts)
Padovani v. Italy, 26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7-B
Pakelli v. Germany, no. 8398/78, Commission's report of 12 December 1981
Paksas v. Lithuania [GC], no. 34932/04, ECHR 2011 (extracts)
Pandjigidze and Others v. Georgia, no. 30323/02, 27 October 2009
Pandy v. Belgium, no. 13583/02, 21 September 2006*
Papon v. France (dec.), no. 54210/00, ECHR 2001-XII
Papon v. France (no. 2), no. 54210/00, ECHR 2002-VII
Paraponiaris v. Greece, no. 42132/06, 25 September 2008*
Parlov-Tkalcic v. Croatia, no. 24810/06, 22 December 2009
Pedersen and Baadsgaard v. Denmark, no. 49017/99, 19 June 2003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no. 25444/94, ECHR 1999-II
Pelladoah v. the Netherlands, 22 September 1994, Series A no. 297-B
Pello v. Estonia, no. 11423/03, 12 April 2007
Penev v. Bulgaria, no. 20494/04, 7 January 2010
Peñafiel Salgado v. Spain (dec.), no. 65964/01, 16 April 2002*
Perna v. Italy [GC], no. 48898/99, ECHR 2003-V
Pescador Valero v. Spain, no. 62435/00, ECHR 2003-VII
Petyo Petkov v. Bulgaria, no. 32130/03, 7 January 2010*
Pfeifer and Plankl v. Austria, 25 February 1992, Series A no. 227
Pham Hoang v. France, 25 September 1992, Series A no. 243
Phillip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1087/98, ECHR 2001-VII

Pierre-Bloch v. France, 21 Octo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
Piersack v. Belgium, 1 October 1982, Series A no. 53
Pishchalnikov v. Russia, no. 7025/04, 24 September 2009
Planka v. Austria, no. 25852/9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5 May 1996
Poitrimol v. France, 23 November 1993, Series A no. 277-A
Polyakov v. Russia, no. 77018/01, 29 January 2009
Poncelet v. Belgium, no. 44418/07, 30 March 2010*
Popov v. Russia, no. 26853/04, 13 July 2006
Popovici v. Moldova, nos. 289/04 and 41194/04, 27 November 2007
Poppe v. the Netherlands, no. 32271/04, 24 March 2009
Posokhov v. Russia, no. 63486/00, 04 March 2003, ECHR 2003-IV
Previti v. Italy (dec.) no. 45291/06, 8 December 2009*
Priebke v. Italy (dec.), no. 48799/99, 5 April 2001*
Protopapa v. Turkey, no. 16084/90, 24 February 2009
Pullar v. the United Kingdom, 10 June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Putz v. Austria, 22 February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
Quaranta v. Switzerland, 24 May 1991, Series A no. 205
R. v. Belgium, no. 15957/90, Commission decision of 30 March 1992, DR 72
R. v. United Kingdom (dec.), no. 33506/05 4 January 2007
Radio France and Others v. France, no. 53984/00, ECHR 2004-II
Raimondo v. Italy, 22 February 1994, Series A no. 281-A
Ramanauskas v. Lithuania [GC], no. 74420/01, ECHR 2008
Rasmussen v. Poland, no. 38886/05, 28 April 2009
Ravnsborg v. Sweden, 23 March 1994, Series A no. 283-B
Raza v. Bulgaria, no. 31465/08, 11 February 2010
Refah Partisi (the Welfare Party) and Others v. Turkey (dec.), nos. 41340/98 and 41342-44/98, 3 October 2000*
Reinhardt and Slimane-Kaïd v. France, 31 March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
Richert v. Poland, no. 54809/07, 25 October 2011
Riepan v. Austria, no. 35115/97, ECHR 2000-XII
Ringeisen v. Austria, no. 2614/65, 16 July 1971, Series A no. 13
Ringvold v. Norway, no. 34964/97, ECHR 2003-II
Rouille v. France, no. 50268/99, 6 January 2004
Rowe and Davi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28901/95, ECHR 2000-II
Ruiz Torija v. Spain, 9 December 1994, Series A no. 303-A
Rupa v. Romania (no. 1), no. 58478/00, 16 December 2008*
Rushiti v. Austria, no. 28389/95, 21 March 2000
S. v. Switzerland, 28 November 1991, Series A no. 220
S.N. v. Sweden, no. 34209/96, ECHR 2002-V
Saadi v. Italy [GC], no. 37201/06, ECHR 2008
Saccoccia v Austria (dec.), no 69917/01, 5 July 2007
Sadak and Others v. Turkey (no. 1), nos. 29900/96, 29901/96, 29902/96 and 29903/96, ECHR 2001-VIII
Şahiner v. Turkey, no. 29279/95, 25 September 2001
Sainte-Marie v. France, 16 December 1992, Series A no. 253-A
Sakhnovskiy v. Russia [GC], no. 21272/03, 2 November 2010
Salabiaku v. France, no. 10519/83, 7 October 1988, Series A no. 141-A
Salduz v. Turkey [GC], no. 36391/02, ECHR 2008
Şaman v. Turkey, no. 35292/05, 5 April 2011

Sapunarescu v. Germany (dec.), no. 22007/03, 11 September 2006
Saric v. Denmark (dec.), no. 31913/96, 2 February 1999
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17 Dec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Schenk v. Switzerland, 12 July 1988, Series A no. 140
Scheper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39209/02, 5 April 2005
Schmautzer v. Austria, 23 October 1995, Series A no. 328-A
Schneider v. France (dec.), no. 49852/06, 30 June 2009*
Schwarzenberger v. Germany, no. 75737/01, 10 August 2006
Sejdovic v. Italy [GC] no. 56581/00, ECHR 2006-II
Sekanina v. Austria, no. 13126/87, 25 August 1993, Series A no. 266-A
Seleznev v. Russia, no. 15591/03, 26 June 2008
Seliwiak v. Poland, no. 3818/04, 21 July 2009
Sequeira v. Portugal (dec.), no. 73557/01, ECHR 2003-VI
Shanno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67537/01, ECHR 2004-IV
Sibgatullin v. Russia, no. 32165/02, 23 April 2009
Sidabras and Diautas v. Lithuania, (dec.), nos. 55480/00 and 59330/00, 1 July 2003
Silickienė v. Lithuania, no. 20496/02, 10 April 2012
Sipavičius v. Lithuania, no. 49093/99, 21 February 2002
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 7 July 1989, Series A no. 161
Solakov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no. 47023/99, 31 October 2001, ECHR 2001 - X
Sofr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no. 37235/97, ECHR 2003-VIII
Stanford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16757/90, 23 February 1994, Series A no. 282-A
Stitic v. Croatia, no. 29660/03, 8 November 2007
Stoichkov v. Bulgaria, no. 9808/02, 24 March 2005
Stojkovic v. France and Belgium, no. 25303/08, 27 October 2011
Stow and Gai v. Portugal (dec.), no. 18306/04, 4 October 2005*
Suhadolc v. Slovenia (dec.), no. 57655/08, 17 May 2011
Suküt v. Turkey, (dec.), no. 59773/00, 11 September 2007
Sutter v. Switzerland, no. 8209/78, 22 February 1984
Szabó v. Sweden (dec.), no. 28578/03, 27 June 2006
Tabaï v. France (dec.), no. 73805/01, 17 February 2004*
Tarău v. Romania, no. 3584/02, 24 February 2009*
Taxquet v. Belgium [GC], no. 926/05, ECHR 2010
Teixeira de Castro v. Portugal, 9 June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V
Telfner v. Austria, no. 33501/96, 20 March 2001
Thomann v. Switzerland, 10 June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Thomas v. United Kingdom (dec.), no. 19354/02, 10 May 2005
Tierce and Others v. San Marino, nos. 24954/94, 24971/94 and 24972/94, ECHR 2000-IX
Tirado Ortiz and Lozano Martin v. Spain (dec.), no. 43486/98, ECHR 1999-V
Toeva v. Bulgaria (dec.), no. 53329/99, 9 September 2004
Topic v. Croatia, no. 51355/10, 10 October 2013
Trepashkin v. Russia (no. 2), no. 14248/05, 16 December 2010
Trofimov v. Russia, no. 1111/02, 4 December 2008
Twalib v. Greece, 9 June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V
Ubach Mortes v. Andorra (dec.), no. 46253/99, ECHR 2000-V
Ucak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44234/98, 24 January 2002
V. v. Finland, no. 40412/98, 24 April 2007
V.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24888/94, ECHR 1999-IX

Vacher v. France, 17 Dec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19 April 1994, Series A no. 288
Van Geyseghem v. Belgium [GC], no. 26103/95, ECHR 1999-I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23 April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I
Vanyan v. Russia, no. 53203/99, 15 December 2005
Vaudelle v. France, no. 35683/97, ECHR 2001-I
Vayıç v. Turkey, no. 18078/02, ECHR 2006-VIII (extracts)
Vera Fernández-Huidobro v. Spain, no. 74181/01, 6 January 2010
Veselov and Others v. Russia, nos. 23200/10, 24009/07 and 556/10, 11 September 2012
Vidal v. Belgium, no. 12351/86, 22 April 1992, Series A no. 235-B
Vidgen v. the Netherlands, no. 29353/06, 10 July 2012
Viorel Burzo v. Romania, nos. 75109/01, 12639/02, 30 June 2009*
Visser v. the Netherlands, no. 26668/95, 14 February 2002
Vladimir Romanov v. Russia, no. 41461/02, 24 July 2008
Vronchenko v. Estonia, no. 59632/09, 18 July 2013
W.S. v. Poland, no. 21508/02, 19 June 2007
Walchli v. France, no. 35787/03, 26 July 2007*
Welke and Bialek v. Poland, no. 15924/05, 1 March 2011
Wemhoff v. Germany, 27 June 1968, Series A no. 7
Wierzbicki v. Poland, no. 24541/94, 18 June 2002
Włoch v. Poland (dec.), no. 27785/95, 30 March 2000
X. v. Austria, no. 6185/7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9 May 1975, DR 2, pp. 68 and 70
X. v. Belgium, no. 7628/7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May 1977, DR 9, p. 169
Y v. Norway, no. 56568/00, ECHR 2003-II (extracts)
Y.B. and Others v. Turkey, nos. 48173/99 and 48319/99, 28 October 2004*
Zagaria v. Italy, no. 58295/00, 27 November 2007*
Zana v. Turkey, 25 Novem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I
Zarouali v. Belgium, no. 20664/92,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9 June 1994, DR 78
Zdravko Stanev v. Bulgaria, no. 32238/04, 6 November 2012
Zhuk v. Ukraine, no. 45783/05, 21 October 2010
Zhupnik v. Ukraine, no. 20792/05, 9 December 2010
Zollman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62902/00, ECHR 2003-XII
Zoon v. the Netherlands, no. 29202/95, ECHR 2000-XII

*只有法文判决